

美中关系：

积极的议程、负责的道路



美中关系：  
积极的议程、负责的道路

独立工作组报告

对外关系理事会赞助



对外关系理事会成立于 1921 年，是一个独立的、会员制的全国性组织。它属于非党派的研究中心，是学者专心研究和传播思想的园地，其宗旨是让在美国及其它国家的个人或企业机构、决策者、新闻从业人员、学生和有兴趣的人士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了解美国和其它政府所面对的外交政策抉择。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本理事会召集会议、主持广泛的研究项目、出版以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为主要内容的著名的《外交季刊》、保持会员背景的多元性、赞助独立工作组并通过本理事会的网页（CFR.org）提供有关全球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最新信息。

本理事会作为机构对政策问题不采取任何立场，也与美国政府没有任何从属关系。作者作为个人对他们在本理事会的刊物中所发表的事实说明和意见负全部的责任。

本理事会赞助一个独立工作组的条件是（1）研究课题对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至关重要；（2）一个背景和意见相左的群体有可能可以通过私下的、无党派的讨论而对某个政策达成有意义的共识。工作组一般是在短时间内会面二至五次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工作组在得出结论之后发表一份报告。本理事会出版该报告的文本并将之发表在理事会的网页（CFR.org）上。工作组的报告反映的是一个有分量和有意义的政策共识。工作组的成员不一定同意每一项结果或建议，但认同工作组所达成的总体政策方向和判断。认同该共识的工作组成员可以提呈附加或反对意见，这些意见都会纳入最后的报告中。“主席报告”必须由工作组的主席签署，该报告一般是在最终的工作组报告出台之前或之后发表。得出结论之后，工作组还可以邀请非工作组成员发表他们对工作组报告的看法以加强报告的影响力。所有工作组报告的调查结果是以现届政府的政策作为“基准”，藉此明确表示他们是赞同还是不赞同政府在不同领域的政策。工作组对自己的报告负全责。本理事会不采取任何立场。

若想进一步了解有关本理事会或本独立工作组的信息，请致函 Publication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58 East 68<sup>th</sup> Street, New York, NY 10021 或致电 212-434-9888 向本理事会的对外联络办公室查询。本理事会的网址：CFR.org。

对外关系理事会®公司 2007 版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于美利坚合众国印刷

根据美国版权法案第 107 条和 108 条（17 U.S.C. Sections 107 and 108）规定，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未经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明确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和摘录。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请致函 Publications Offic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58 East 68<sup>th</sup> Street, New York, NY 10021。

工作组主席

丹尼斯布莱尔

卡拉希尔斯

项目主任

法兰克赞努兹



## 工作组成员

罗杰尔奥特曼 Roger C. Altman

彼德贝斯 Peter E. Bass

丹尼斯布莱尔 Dennis C. Blair

海洛德布朗 Harold Brown\*

埃斯顿卡特 Ashton B. Carter

傅瑞伟 Charles W. Freeman III

亚伦弗里德伯格 Aaron L. Friedberg\*

葛维宝 Paul Gewirtz

莫里斯格林伯格 Maurice R. Greenberg\*

何汉理 Harry Harding\*

卡拉希尔斯 Carla A. Hills

法兰克赞努兹 Frank Sampson Jannuzi

麦克佐尔丹 Michael H. Jordan

甘维珍 Virginia Ann Kamsky\*

兰普顿 David M. Lampton

拉迪 Nicholas R. Lardy

赫伯特雷文 Herbert Levin\*

李成 Cheng Li

洛德 Winston Lord\*

吕晓波 Xiaobo Lü

麦艾文 Evan S. Medeiros

毛文杰 James C. Mulvenon

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

欧林斯 Stephen A. Orlins

埃文斯里维尔 Evans J. R. Revere

布拉德里罗伯特斯 Bradley H. Roberts

容安澜 Alan D. Romberg

薛瑞辐 Randy Shriver\*

雯狄舍尔曼 Wendy R. Sherman

林蔚 Arthur Waldron\*

\*这些个人背书了本报告并提呈了附加或不同的意见。





# 目录

前言.....	xi
致谢.....	xiii
地图.....	xv
缩略语.....	xvii
工作组报告.....	1
引言.....	3
美国未来的对华战略.....	6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型.....	8
中国如何面对世界.....	21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29
美中关系.....	34
工作组建议.....	45
结论.....	58
附加与不同意见.....	59
工作组成员.....	65
工作组观察员.....	72



## 前言

在 21 世纪，世界强国美国和世界崛起的大国中国之间的关系比任何关系都来得重要。中国的发展不仅直接地改变了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生活，也间接地影响了其他几十亿人口的生活。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在区域与全球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持续的军事现代化以及滞后的政治改革不仅改变了地缘政治的格局，也加剧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美中两国在进行了 35 年的“接触”之后所发展出的关系在两代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同时，有些美国人仍然相信中国的战略利益与美国的战略利益互不相容。

对外关系理事会建立了独立的工作组来分析当今中国的变化并判断这些变化对中国和美中关系的意义。在谨慎地评估了中国目前发展的情况和中国未来可能的发展轨迹之后，工作组建议美国制定一个着重于把中国纳入全球社会的政策，并认为这种做法将鼓励中国使自己的行为与美国的利益和国际准则保持一致。工作组最后提出一系列的提议，旨在加强最近为深化美中合作所作出的努力。报告的基本信息是，美国应该不能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在经济、政治与安全方面的挑战视若无睹，也应当明确表明中国任何挑衅性的行为将遭到坚决的反对，但同时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必须创造和利用机会，以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和一些全球性的问题为基础进行发展。

我谨代表对外关系理事会，感谢工作组联席主席卡拉希尔斯女士和布莱尔上将，对这个重要的项目提供了他们丰富的经验和不懈的支持。本理事会也特别感谢工作组的每一位成员，他们的想法与见解使本报告更加完善。我也要感谢本理事会的前塞鲁斯万斯外交研究员 Evans J. R. Revere，他为此项目开了头；也要感谢日立国际事务研究员 Frank Sampson Januzzi，他虽然远在地球的另一端，却依然成功地促使这份报告问世。

理查德·哈斯 (Richard N. Haass)

对外关系理事会会长

2007 年 4 月



## 致谢

分析目前发生在中国的变化和这些变化对中美关系的意义必须先清除两个障碍。首先，中国是不会静坐着让人评论的。在过去的 16 个月里，一些重要的事态发展，包括中国与邻国关系戏剧性的变化、北京国内政策做出的调整、北朝鲜进行核试验和中国利用导弹摧毁了自己的一颗卫星，使对外关系理事会所赞助的美国对华政策独立工作组的工作更显复杂。中国与其东亚邻国的关系并非是稳定的，因此工作组在这方面也必须相应的予以关注。第二，中国在美国的政治想象力中占有特殊地位，经常引起公众的强烈意见，使我们很不容易在判断上达到共识。若没有卡拉希尔斯和布莱尔上将两位联席主席熟练、不偏不倚和耐心的领导，本工作组不可能就中国和美中关系做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他们为此项目注入丰富的经验、智慧和热忱，和他们一起工作是一种享受。

尽管本工作组是完全独立的，我们仍然要对我们的工作提供支持、“事实查证”和引导的每一位表示衷心的感谢。本工作组项目的行政主任 Lee Feinstein 从始至终掌握着全过程，确保工作组坚持目标并提醒工作组要保持结论明确，做到论点、证据充分。在理事会本身，C.V. Starr 高级研究员和亚洲研究主任 Elizabeth C. Economy，格林伯格地缘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 Sebastian Mallaby，和格林伯格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史国力 Adam Segal 都慷慨地为此艰巨复杂的项目提供了他们的一份专长。其他理事会的同事也是大力协助：Lindsay Workman 和 Samm Tyroler-Cooper 负责所有的后勤和研究需要；对外联络组的 Lisa Shields 和 Anya Schmemmann 把报告送交到有关人士并使之广为流传；理事会华盛顿项目的 Nancy E. Roman 和同事安排了在华盛顿举行的报告初次展示活动；Irina A. Faskianos 安排工作组向一批学者作出汇报；理事会的出版组 Patricia Lee Dorff 和 Lia C. Norton 进行校订、排版并最后定稿。

理事会的前塞鲁斯万斯外交研究员、现任韩国协会的会长 Evans J. R. Revere，启动了个项目并把工作组的重点调查结果和政策建议整理成册，使这些重点能够更好地得到进一步的讨论。工作组的每一位成员都在审议中做出贡献，本工作组要特别感谢 Harry Harding, Nicholas R. Lardy, Thomas J. Christensen, Virginia Ann Kamsky, Stephen A. Orlins, and James C. Mulvenon。他们对本工作组所作的汇报激起了非常活跃的辩论。我们也要特别感谢 Alan D. Romberg，他在校订方面可谓眼光敏锐。

本工作组衷心感谢我们多次寻求意见的著名学者专家，特别是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的 Bonnie S. Glaser；前美中商务理事会会长 Robert A. Kapp 也提供了有见地的指导。我个人也要感谢对外关系理事会负责会员和研究员事务的副会长 Elise Carlson Lewis，她所管理的国际事务研究员项目使我有机会到日本学习和教学。

工作组要特别感谢对外关系理事会会长 Richard N. Haass。他领会到，尽管美国在面对世界其他各方面挑战，美中关系对美国的未来，甚至对全世界的未来，依然至关重要。

最后，对外关系理事会要感谢斯达（Starr）基金会和 David M. Rubenstein 对工作组的项目给予慷慨的支持。

法兰克赞努兹（Frank Sampson Jannuzi）  
项目主任

# 地图



来源：中央情报局





## 缩略语

APEC	亚太经合组织
ARF	东盟地区论坛
ASEAN	东盟
CCP	中国共产党
CNOOC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COCOM	协调委员会
CSEPA	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CSIS	战略与国家研究中心
CSR	企业社会责任
DPP	民进党
ETIM	东突独立运动
EU	欧盟
FDI	外国直接投资
GAO	政府问责办公室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PA	政府采购协议
ICBM	洲际弹道导弹
IEA	国际能源署
IIE	国际经济研究所
IPR	知识产权
NCND	“不确认也不否认”
NDEA	国防教育法案
NGO	非政府组织
OECD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IE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PAROS	防止外层空间军事竞赛
PASSEX	交汇演习
PLA	中国人民解放军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
SAIC	国家工商管理总局
SAREX	搜救演习
SARS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非典）
SCO	上海合作组织
SOE	国有企业
TAR	西藏自治区
TRA	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IP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MD  
WTO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世界贸易组织

# 工作组报告



# 引言

## 压力重重的政治共识

三十五年前，尼克松总统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伸出了手，目的是要通过制衡苏联和进一步分化两个前共产主义同盟国，来促进美国的战略利益。尼克松和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向中国通报了苏联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并就越南战争和台湾问题<sup>1</sup>进行了讨论。尼克松和基辛格希望将美国的全球立场从对抗转为缓和，并使美国摆脱越战的困境。他们的行动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sup>2</sup>。

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对中国（和台湾）的政策一直是以这个战略利益为基础，而正是这种利益促使了尼克松在冷战正酣的时候前往北京。此战略一般被称为“接触”战略。通过接触，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从几乎是经常不断的对抗转为经常不断的对话与合作。

同时，中国本身也通过与世界的接触开始发生变化。美中关系在卡特执政期间的正常化，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使中国能在 1970 年代末启动由邓小平领导的经济改革。接触政策使中国被许多多边组织所接纳，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东盟地区论坛（ARF）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中国终于成为了国际舞台上的一员。

在安全领域中，中国过去一向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但今天与各国保持了联系。中国已经成为各种军控条约和相关的不扩散组织的成员国，同时也渐渐地调整国内的法规以配合国际要求。中国加入了不扩散条约、化学武器公约及核供应国集团，同意遵守导弹技术控制制度的限制，并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中国与世界接轨的过程是曲折的。当中国政府于 1989 年 6 月在天安门广场残酷镇压抗议者时，美国的回应是：切断与北京的安全关系，同时把对人权的关注列为美中关系的主要议程。两年后，当苏联解体时，尼克松为与中国进行接触而采纳的冷战逻辑依据——“战略三角”——也跟着烟消云散。美中关系的焦点从而转向新的领域，包括不扩散、贸易和地区安全等领域。

---

<sup>1</sup> 根据最近解密的有关尼克松于 1972 年 2 月 22 日与中国总理周恩来会晤的纪录，尼克松私下保证美国不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表示华盛顿支持任何可通过谈判达成的“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该纪录可在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publications/DOC\\_readers/kissinger/nixzhou/index.html](http://www.gwu.edu/~nsarchiv/nsa/publications/DOC_readers/kissinger/nixzhou/index.html) 获取。

<sup>2</sup>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请看 Margaret MacMillan, “*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尼克松与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 (New York: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2007), pp. xvi-xxii.

今天，地缘政治的版图又在移位，因为自从苏联解体后，中国在美国所垄断的世界中已经崛起，成为了大国。美国采用接触的方法使中国利益的发展能以美国政府乐见的方式出现，尽管在这方面总体来说取得了成功，美国对于接触策略的政治支持却开始动摇。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扩大，人们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很不确定。大家关心的是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的经济、医疗、安全及全球政治会有什么影响。许多美国人不能肯定，中国今天的战略利益是否仍与美国的战略利益相一致，他们认为接触政策不足以保护美国免遭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而中国很可能在未来成为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对手<sup>3</sup>。其他人的结论则与赫尔姆斯（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在 1990 年代末所得出的结论一样。他曾经说，“与中国进行经济接触的支持者必须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绥靖主义...我们必须有新方法。”<sup>4</sup>

实际上，从 1989 年天安门悲剧的低潮时期到现在，一般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已有了改善。2004 年的佐格比（Zogby）民意调查显示有百分之五十九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赞同”的看法，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会构成严重的经济威胁<sup>5</sup>。大部分有关中国的书籍或文章也与这种看法一致。但是，与几十年前美国面对日本的情况一样，美国现在也存在反对观点，持这种意见的人舆论造得很大，他们杞人忧天，认为美中大动干戈在所难免。

到底什么是这种不安的源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中国对美国庞大而且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是主要因素之一。一提到中国带来的经济挑战，人们就联想到全球化的挑战，特别是联想到与低工资国家竞争所带来的压力。

第二，中国对政治自由和对人权的尊重与中国人民所应有的相去甚远，中国人民本该享有更好的自由与人权。美国几届政府都认为与中国保持正常关系可以促进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担任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的赖斯女士于 2000 年 2 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贸易总的来说可以使中国的经济开放，最终也使它的政治开放。这种观点的基础是相信市场力量和经济自由能驱动政改，而这种信心已经从我们的全球经验中得到确认<sup>6</sup>”。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掌握着独裁权力，限制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并压制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控制原则进行批评。这与其在经济领域给予企业家的自由程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98 年 6 月，克林顿总统曾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进行了热烈的辩论。克林顿总统认为“二十一世纪的稳定需要中国有高度的自由”。布什总统也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尽管有这种压

---

<sup>3</sup> Khalizad, et 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es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美国与崛起的中国：战略与军事意义) (Santa Monica, CA: The RAND Corporation, 1999). Bates Gill, *Rising Star: 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 (后起之秀：中国的新安全外交)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有更新的评估。

<sup>4</sup> 华盛顿邮报 2000 年 3 月 31 日，赫尔姆斯：“两个中国”。

<sup>5</sup> 此项调查由国家级非党派组织，百人会委托 Zogby 于 2004 年进行。调查结果从该委员会的网页 [www.committee100.org](http://www.committee100.org) 上获取，获取日期是 2007 年 2 月 1 日。

<sup>6</sup> 外交季刊，2000 年 1/2 月期，赖斯：“2000 年选情：促进国家利益”。

力，中国的政治改革仍然停滞不前。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指出，在胡锦涛主席的执政期间，根据国际的准则衡量，中国的人权还显出一些倒退<sup>7</sup>。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在东南亚、中东、非洲及拉丁美洲不断扩大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以及这种影响力对美国的利益可能产生的后果。接触政策的批评者们认为中国不是在为全球秩序的稳定和强化做努力，而是寻求接替美国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领导地位、改写美国参与建立的机构之规则、并削弱美国在与北朝鲜、伊朗和苏丹这类国家周旋时的优势地位（中国利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阻挡一些严厉行动，而这些行动的目的是要阻止某些地区的大规模屠杀）。

第四，中国的经济成长为北京提供了进行军队现代化所需要的资金——过去十年的国防预算增长，包括 2007 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的军费——与此同时甚至还有资金发展一个坚实的航天项目。这导致某些人士担心中国将很快地成为美国在军事方面“可以相匹敌的竞争对手”，一个在东亚能与美国争雄，在全球能显示力量的国家。而中国国防的神秘面纱更助长了这种焦虑不安。

最后，一个崛起的中国所构成的挑战来得也不是时候，因为此时美国正全神贯注地投入在全球的反恐行动中，而且为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稳定，还不得不背起沉重的军事和政治包袱。这些当务之急消耗了美国的精力和资源，而偏偏在此时美国却急需一个明确和一贯的政策方向，使美国人就如何以最好的方式与中国交往达成共识。

*综观中美关系，本工作组认为中国在过去三十五年来与美国的接触总的发展轨迹是积极的。中国越来越遵守国际规则、制度及准则，特别是在贸易和安全领域内，标志着中国与全球正在接轨。中国也更加留意美国的看法，特别是在那些中国认为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而对中国却不甚重要的议题上。本工作组的评估不仅是基于中国采取的行动，也基于接触政策所释放出来的各种能量的威力。国际贸易与外资、企业家精神、互联网、司法培训、条约承诺、海外旅行、受教育机会的扩大及数量不断增加的非政府组织等因素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改进法治、增加透明度与责任追究、并更好地遵守国际准则。中国已经是国际社会无法分开的一员，其利益越来越与国际社会的结构息息相关。一个为中国带来繁荣昌盛的国际体系的未来对中国越来越举足轻重。*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紧密接轨，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日趋强大，态度也愈趋自信，从而更加凸现了中美在某些领域的利益分歧，这些领域包括谋求不扩散目标的最佳途径、对人权的尊重（特别是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以及当一个国家（例如苏丹）严重的违反国际准则时，如何限制该国家利用国家主权来避开外界的干预。美国不应满足于中美关系的现况，也不应该对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在*

---

<sup>7</sup> 请参看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劳工司的国别人权报告：中国，2006 年 3 月 8 日。本报告可在 <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5/61605.htm> 获取。



经济、安全与政治方面所呈现的挑战不闻不问。美国的对华政策必须为缩小分歧，扩大共同利益提供手段和创造机会。

## 美国未来的对华战略

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于 2005 年 9 月 21 日在中美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说时，就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作了最详尽的解释。佐立克呼吁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佐立克的措辞谨慎，明确坦诚，值得赞赏。佐立克承诺美国将继续努力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同时他也表示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也做好“两手准备”，以防中国对美国的利益进行挑衅或抱有敌意。

北京和华盛顿一样，对全球化的支持面临重重压力。虽然中国的官方政策是和平发展，但有些中国人士对美国的意图和如何最好地平衡与美国的关系存有争论。一些中国官员认为美国在中亚的军事部署以及与蒙古和越南的友好动作是围堵中国策略的一部分。北京也深切关注美国军售给台湾的影响，而军事策划人员也担心在危机出现时，美国会试图切断中国战略商品的来源。一些中国的战略家以美国对先进技术的出口管制为例子，辩称美国企图阻挠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些人相信美国对中国民主的呼吁显露了美国有意要在中国社会酝酿类似东欧“颜色革命”的动乱。最后，虽然中国人总的来说对美国人是友好的——正如美国人对中国人也是友好的——但是有些事件是中国人不能忘记而且感到愤慨的，如 1999 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美国被认为阻挡了中国取得 2000 年的奥运主办权，还有 2001 年中国一架战斗机与美国一架电子侦察机发生致命撞击事件。

本工作组在提出一个合适的，能在全球化时代促进中美关系的总的战略时，所考虑的方面包括：美中有共同利益扩大的领域，继续存在的分歧，相互之间的猜疑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本工作组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的重点应当放在让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这一积极议程上，藉此更好地促使中国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能以现有的合作领域为基础进行发展，并在地区和全球面临的挑战方面开创新的合作机会。接轨是一条负责的道路，因为它包括让中国参与相互关注的议题，让中国被纳入安全、贸易和人权的国际机制，并让中国不断扩大的军事力量得到制衡。这三方面可以也应该竭尽国力所及，利用一切手段，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的手段，同时推动这三方面的工作。美国不可能确定中国的发展方向——即它将如何沿着河道走——但美国经常可以看清河道的两岸；在这些河道的两岸间，中国领导人必须谨慎航行。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对这种不确定性做好准备。正如美国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样，这种策略肯定包含“两手准备”的内容，目的是促使中国不去采用适得其反的政策，同时也能在劝说中国失败后拿出替代方案。这点美国不需要向中国隐瞒。但是美国的政策应该是把重点放在与中国建立一个紧密、坦率和合作性的关系上，以便增进双方的共同利益并通过建设性的手段处理分歧。*

接下来本工作组将分析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以及这些挑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更具体地说，对美中关系意味着什么。本报告在结束时提出了政策建议，旨在实施一项前后一致、积极的策略，让中国与世界接轨。本工作组相信，在面对一个经济和军事力量不断扩大，在国内面临严峻挑战，同时又不断变化的中国时，采取我们建议的策略最能促进美国的利益。

#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型

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几乎怎样形容中国都可能是“正确”的。纵观中国，它是即现代又古典，即是共产主义又是资本主义，即富裕又贫穷，即欢迎改革又抗拒巨变，即是单调的又是多元化的，即压制人又给人自由，即十分保守又懂得修正，即消极又积极，即是强大的又是脆弱的。

中国的快速变化也是让外界不易了解中国的一个因素。美国若要制定健全的对策，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促进本身的利益，就必须确定有关中国的基本事实，同时正确评估中国正在发生之变化的方向和速度。要做到这点，可以从观察中国的经济成长及其结果开始。

## 持续的经济扩张使千百万人脱贫

中国正处在一个强劲和稳健的经济扩张期，其规模是空前的，直接地影响了地球上五分之一人口的生活。自 1988 年开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年均 8.5% 的速度增长。根据中国官方的汇率计算，中国在 2006 年的 GDP 是 2.5 万亿美元，在全世界仅排名在美国、日本及德国之后。若按照实际购买力来评价，中国在 2006 年的 GDP 大约是 10 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排名夸大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贸易和投资活动是通过汇率进行和衡量的。根据实际购买力评算，中国的人均 GDP（2006 年是 7600 美元）在 229 个国家中排名第 109<sup>8</sup>，比起 80 年代中期，这个数字已经是多了十倍。在 2000 至 2010 年之间，中国的人均 GDP 应该是会翻一番的。

比起处在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国的经济成果显得更出色。在 1955 至 1972 年之间，日本虽然经历几次短暂的经济衰退，其实际 GDP 仍以年均 10% 的速度增长。比较起来，日本战后经济扩张持续最长的时期是 1966 年 11 月至 1970 年 7 月之间，总共长达 57 个月。

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不均衡，却使得每一个省份和几乎每一个阶层的人民受益。对一般中国老百姓来说，经济增长意味着生活品质的提高。约有 4 亿人口脱离极度的贫困。预期寿命达到 72 岁，而（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也从 1970 年的每一千名出生的婴儿就有 120 位夭折降至 2004 年的 31 位。文盲减少了三分之二：今天 93% 的中国人识字，当然文盲仍然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因为在那里儿童必须提前休学加入劳动队伍。在 2004 年之前的十年里，拥有彩电的家庭增加了将近一半。在 2006 年，中国的手机订户达到了 4 亿户。中国的信息产业部预测在未来的五年内，中国的手机用户将再增加 2.5 亿户。

---

<sup>8</sup> 请看 <https://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rankorder/2004rank.html>，于 2007 年 3 月 15 日修订。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私营企业。效率不高的国营部门虽然仍有其作用，但也已从 10 年前的 30 万家国有企业缩小到今天的 15 万家；国营雇员也相应的减少了 40%。国内的高储蓄率和中国称为“改革开放”的过程使私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于 70 年代末期启动的。开放促进了竞争，并刺激了外国直接投资（FDI）。中国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现在经常是排名第一或第二（在美国之后）。中国于 2001 年加入世贸之后降低了关税，消除了大部分的配额，迫使国内的公司不得不加强效率和提高生产力。

中国在研发和科教方面也提高了经费，以便激发创新，从而摆脱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产品。人们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大大提高。今天中国的科技劳动队伍包括了 225 万名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中国的大学在 2004 年所颁发的 2.35 万名博士学位（占该年所有博士学位的 70%）的选科主题都是与科学有关。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不仅把制造部门转移到中国，也把高层的工作转移到中国，使中国能够建设一个更现代化的工业经济体。但是，根据国际经济研究所 (IIE) 和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一项研究，中国在研发方面的费用还不到美国的 10%，同时只有 10% 的中国理工科毕业生在国际间具有竞争力<sup>9</sup>。中国的大学制度在过去的三十年虽然有所成长和改善，但是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的“全球一百所最佳大学”的名单上，中国的学校榜上无名。只有两家中国大学挤进（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的全球高校五十强名单：北大排名第 14，清华排名第 28。有些学校的质量太差，许多毕业生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了，也不是与他们能力相当的工作。

*本工作组认为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真正的利益，同时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现代化，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就整体的技术创新来说，中国不太有可能与美国或其它现代工业国家竞争。*

## 巨大的挑战仍然存在

尽管中国近年来取得了成功，它仍然面对巨大的挑战。中国有几乎三分之一的制造业的产出仍然是依靠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由于最具有生产力和管理完善的公司已经私有化，要完成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很不容易。可能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上亿的中国人仍然生活贫困。《中国：资产负债表》这本书提到，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其人均收入在全世界排名第 100，使中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贫困”的世界超级大国<sup>10</sup>。有四亿中国人每天以不到 2 美元过生活，同时缺少日常基本的需要，如清洁用水和足够的住房。中国的贫困人口相当于整个美国和日本人口的总和。中国大部分的地区仍处在贫困中，与上海的繁华街道形成强烈的对比。

---

<sup>9</sup> 请参看 Bergsten, et al., *China: The Balance Sheet: What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about the Emerging Superpower* (中国：资产负债表：)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6), p. 4.

<sup>10</sup> 同上。

除了要照顾穷人的需要，中国的领导人知道他们还必须面对一系列的新挑战，其中有许多是经济增长造成的。环境、人口及公共卫生方面的问题，收入差距的扩大，一个人数不断增加同时要求政府对人民更有回应和更负责任的中产阶级，迟迟不得解决的民族和宗教方面的申诉，还有腐败弊病，都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健全和政治稳定。中国的领导人也意识到在面对这些挑战的同时，他们本身的合法性和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越来越依赖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 环境恶化

中国的环境每况愈下，对经济和总的生活质量造成负面的影响。在狂热推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中国由于过分看重短期的经济发展，轻视环境保护，结果使得空气和水的质量大受影响。美国百货公司货架上的羊绒毛衣价格低廉，其代价是内蒙古山坡上的牧草被过度利用。中国每年因荒漠化损失大约 1700 平方英里的可耕地。中国的国家环保总局（CSEPA）承认环境恶化使中国每年的损失达到了 GDP 的 8% 到 13%——中国的政策如果更加平衡的话<sup>11</sup>，对经济成长的推动可能会更成功。根据中国政府的估计，单是水资源短缺就使每年的工业和农业产出损失 420 亿美元。

中国的空气质量差，而且是每况愈下，在城市地区尤甚。全世界 20 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 16 个是在中国。中国依靠煤炭发电，每个星期就有一家新的煤炭发电厂建成。汽车的数量也将由当今的 2500 万辆增加到 2020 年的一亿辆，进一步促进了地面臭氧和二氧化氮的污染。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全天候的。中国是地球上唯一不经历“周末效应”（即卫星在周末所探测到的二氧化氮含量比在工作日所探测到的较低<sup>12</sup>）的工业国家。建筑工程也加剧空气质量的恶化。北京空气粉尘污染的平均浓度是美国环保署所建议的空气质量标准的 7 倍。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空气污染是导致中国每年 40 万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同时，最近一份有关非典造成的死亡率的研究报告也认为，污染能使病源在中国的传染疾病恶化<sup>13</sup>。

与清洁空气一样，中国的清洁用水也极度短缺。中国的人均供水量只是全球平均供水量的 25%。中国文化的摇篮“黄河”不一定能流到海洋，因为黄河水一路上被新兴的工厂和新建的城市吸干了。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城市没有足够的用水。专家们警告：到了 2030 年，人均的水资源将降至 1760 立方米，与现在国际间所接受的水短缺的基准 1700 立方米已很接近。现在中国已经有三亿人的饮用水被化学物和有毒物污染，有六亿人的水源受到人与动物排泄物的污染。此外，将近一半的河水不适用于农业或工业。

---

<sup>11</sup> 中国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跃的这个估计是针对中国已经被破坏的环境进行补救所需要的成本。潘岳的评论“Environmental Costs in China（中国的环境代价）”可在 [http://www.en-econ.net/2006/12/reducing\\_enviro.html](http://www.en-econ.net/2006/12/reducing_enviro.html) 获得。

<sup>12</sup> Paul J. Crutzen,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生态与环境的边疆），September 2006.

<sup>13</sup> Daniel S. Greenbaum and Robert O’Keefe, “China’s Environmental Health Challenges（中国的环境卫生挑战）,”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September 2006.

中国对环境的影响并不限于国内。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报告说长江的下游污染严重，该河现在已经是太平洋最大的污染源。根据国际能源署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中国将在 2009 年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因为煤炭发电早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硫排放国。来自中国的二氧化硫在韩国和日本造成酸雨。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非自然水银排放源。中国每年向空气排放超过 500 吨的水银，大部分来自煤炭发电厂。相比之下，美国每年的排放量是 120 吨。在美国，有 30% 以上在地面土壤和河道中的水银是来自其他的国家，而中国可能是最大的来源。

本工作组认为如果中国不采纳更有持续性的环境作法并执行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它自身的经济前途将被危及，同时减少气候变暖、保护生物多样性及保护渔业的全球努力也将严重受挫。

### 不利的人口趋势

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加上在健康保护方面的改善，造成了人口方面的两个副作用：因为重男轻女有时候造成女婴的人工流产，使男女的出生比例出现偏差；另外就是中国社会正在快速老龄化。人口的老龄化会导致对老年人提供社会保障和医疗福利非常困难，即使做得到也会使国家破产或使劳动人口陷入贫困。中国人说他们害怕国家“未富先衰”。

- 在大多数社会里，每 100 名女婴出生的同时就有 102 至 106 名男婴出生。在中国，男婴的数字高达 118 名。
- 中国的研究学者说在中国的 13 亿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了 4100 万，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扩大。
-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5 年将达到高峰。在接下来的 25 年的时间里，赡养比率将快速增加。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国际项目部门估计目前每 100 位中国人大约就有 7 位年龄在 65 岁以上。在未来的 30 年里，该年龄组的人口会超过一倍。
- 到了 2030 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达到 2.4 亿人，稍微超过印度尼西亚的总人口。

### 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和社会动荡

尽管中国几乎每一个地区的经济都在成长，贫富之间的差距却不断地扩大。这个国家过去以平等主义自豪，但现在有超过 30 万的百万富豪控制着中国 5300 亿美元的资产<sup>14</sup>。中国沿海省份的收入水平是最贫穷省份的十倍，而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比例超过三比一。这种不断扩大的差距致使大批未受管理的人口流入城市，现在可能有 1.6 亿的劳动者在城市非法居住。这种差距也使较贫困地区的人民感到愤慨，特别是当新的投资项目使得村民必须离开他们几代人辛苦耕耘的土地，或是这些投资项目占据了原来已经稀少的水电资源。许多中国的新贵大多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他们在经济机会方面享受特权，并将所得到的权力化为财富。中国共产党的名誉也因此受到了玷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官员失职、腐败、剥削（包括过度税收及不是出于自愿的或是补偿不足的土地征收）的受害者，使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

<sup>14</sup> 根据美林公司和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数据。

时也面对社会动乱事件的明显增加。在一个以能够控制政治与经济为自豪的制度里，蔓延的公共动乱事件显然是很不寻常的事件。根据中国公安部的报告，中国在2004年发生了7万4千起“群众事件”，而十年前只有一万起。最近发生的抗议事件有些涉及10万人，是1989年天安门惨剧发生之后最大规模的示威。

中国的领导人正在努力为经济比较不发达的地区提供更多机会，并为贫困人口建立一个“社会安全网”。这些努力（如下所述）仍在初始阶段，要评估它们总的影响还为时太早。但是，本工作组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贫困人口的数目会很大，而且即使经济的成长将继续使千百万的人脱贫，中国贫富之间鸿沟的问题有可能会更加突出。造成社会动乱的部分原因是不平等现象的不断扩大，而这种动乱是否会继续恶化就要看政府在扶贫和处理不满的政策是否生效，因为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决定中国的穷人是否认为他们受到政府公平的对待。中国若不放宽政治体系，让人民可以进行和平抗议、使他们有平反冤屈、向政府追究责任及要求政府保持透明的途径，对政府不满的中国人走上街头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 喧嚷的中产阶级

向政府施加压力的不仅是穷人和下层社会的人，还有人数不断增加，来自农村和城市地区的中产阶级。中国的公民要求有清洁的水、更好的住房、更好的医疗服务与教育，更多的政治参与及更准确的信息。中国人现在到国外旅行和求学，有机会把中国与其经济更发达和政治更民主的邻国做比较，而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是他们乐于见到的。为了表示不满，他们有些通过发表文章批评政府的行为，发起互联网博客讨论敏感话题，上法院控告政府官员的不检行为，甚至发动攻势通过直选让人民不满意的地方官员下台<sup>15</sup>。

非政府组织数量的增加反映了中产阶级的这些要求。目前在中国注册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大约有28.5万家，其中有两千多家是环境保护组织。政府一般欢迎从事公共卫生、教育及为残障人士提供服务的非政府组织，但是中国当局，特别是在地方一级，对推动人权、劳工法和宗教自由项目的非政府组织仍然持怀疑态度。非政府组织经常受到官僚主义或专门用来抑制某些团体的政策的束缚。英国的漆咸楼（又称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一项有关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内部的指导方针非常有效地禁止了“某些社会群体”建立非政府组织，包括流动工人、下岗工人和退伍军人<sup>16</sup>。

过去30年所提倡的改革使今天的中国人比在共产党时代的任何时候都能更自立。他们可以自己购房、竞争工作、自付教育和医疗费用并筹措自己的退休金。简单地

---

<sup>15</sup> 有关中国乡镇选举的趋势请参看 Dr. Baogang He, “How Democratic Are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中国乡村选举有多民主)?”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 Dong Lisheng and Jørgen Elklit, “China: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First Steps on a Long March (中国：村委会选举：长征的第一步)?” ACE 选举知识网，2006年3月14日，可在 <http://aceproject.org> 获取。

<sup>16</sup> Yiyi Lu, “The Growth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Key Challenges for NGOs (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非政府组织的主要挑战)”。Chatham House Briefing Paper, 2005年10月。

说，他们可以独立安排自己的未来，而不再是共产党提供一切的制度的受惠者。人民情愿冒着失去经济安全的风险，以换取更多的经济机会和承担更大的个人责任。这个新的社会契约暗示，中国公民将在治理国家方面起更积极的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必须更加关心人民的意愿。但是人民和政府是否承认这个新契约的存在还不清楚。即使他们承认了，他们是否接受其中的相互义务也很难说。

*本工作组认为中国经济重组所带来最重要的变化是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虽然在有关中国崛起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经验性数据中，这种变化并不显而易见，但是在塑造中国未来的过程中，这种变化可能具有同等意义，甚至更有意义。在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台湾和印度尼西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产阶级的出现促成了民主制度，结束了独裁专制。在中国，初始的迹象表明，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他们会更积极地通过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其他部门要求政府更有效率和更负责任。但这并不表示有了这股“势不可挡的潮流”，一个更民主的制度就绝对会在中国出现。在经济和政治发展方面，中国走的是自己的道路。在近期内，中国的不愿冒险并希望保护自己利益的中产阶级是不太可能支持自由民主或发展一个具有竞争性的多党政治体系，但是他们可能会要求中国进行更多适度的改革。真正推动法律制度改革的是一些希望能够达到中产阶级地位的人，还有那些受到贪污腐败不利的影响但又无法通过法律途径求得正义的人。*

### *具有潜在危险的民族与宗教问题*

受到中国官方承认的 56 个少数民族大部分居住在偏远地区。他们对政治或经济的影响力有限。但是其中有两个群体——维吾尔族穆斯林和藏族——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具有战略意义，同时在历史上，包括他们实际不受到中国统治的时期，他们一直与占多数的汉族有过抗争。中国西北的穆斯林半自治区新疆与西藏自治区占有中国 40% 的土地，但是仅有占中国不到 5% 的人口。新疆有 2000 万穆斯林居住在不毛之地，那一地区也是中国蕴藏石油最丰富的地带。有五百万的藏人（包括在西藏自治区及毗邻的西藏少数民族居住地）住在全世界最高的平原。那里不仅盛产铀矿和其它稀有矿物，也是亚洲四大河流：印度河、布拉马普特拉河、萨尔温江及湄公河的源头。西藏与印度接壤，同时拥有估计占全世界一半的水力发电潜能。

中国在发展新疆和西藏的过程中，当地的老百姓在决策方面没有实际意义的参与。事实上，在重要的问题上，地方自治最受限制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所谓自治区或管辖区。虽然总的来说那里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但获益的大部分是汉移民，而不是当地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经常因为缺乏教育、技能、语言能力与人际关系而无法有效地争取到政府的合同或无法向新迁入的汉民提供服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这两个地区的分离主义活动导致了流血镇压。中国的领导人今天仍旧对他们称为“分离主义”或“恐怖主义”的活动保持警惕。在 2005 年，大约有 130 位大部分是僧侣或尼姑的藏民因政治理由被监禁。目前在拉



萨的监狱里大约有 55 名“反革命罪”政治犯<sup>17</sup>。在新疆，一个反对“极端主义，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活动导致了数以千计的维吾尔族人被关押或是被起诉，有许多还被判处死刑。自从 911 恐怖袭击后，中国加强了在对新疆的管制。甚至在 911 之前，中国就一直希望东突独立运动组织（ETIM）被美国列入其恐怖组织的名单，而美国后来也决定这么做了。美国此举似乎让中国大胆地打着美国展开的反恐怖主义旗号向维吾尔族分离主义分子，包括那些放弃暴力的人士，进行更厉害的镇压。

虽然西藏和新疆的情况仍不稳定，目前的趋势是向吸收和同化发展，而不是反抗和独立。汉人的西迁（有些是受到政府的鼓励，有些是对经济机会的自然反应）使当地的维吾尔族和藏族快速成为自己城市里的少数民族。没有证据显示这种西迁会结束。中国与其中亚的邻国进行的石油和边境贸易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来到中国的西北边疆地带。2006 年开通的青藏铁路几乎肯定地会让更多的汉人永久迁移到西藏。

中国的领导人对分离主义分子高度警惕，同时对宗教组织的发展也非常关注。他们制定了严格的法律，要求宗教团体向政府登记，并把它们的社会福利活动局限在政府批准的范围内，例如脱贫和公共医疗，这些都证明了他们的关注。中国的领导人非常熟悉历史事件，如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与义和团运动，知道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曾经在中国带来狂热和社会分裂。中国共产党虽然现在欢迎企业家入党，却公开地禁止宗教人士入党。中国压迫地下新教教会并对天主教会严加控制（例如任命中国自己的主教）。北京方面对天主教会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地方，那就是梵蒂冈与台湾所保持的外交关系。自从 1999 年一万名法轮功的信徒在北京的中南海外静坐抗议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后，中国也对法轮功信徒施行特别的贬斥（逮捕、殴打、镇压）。正如“人权瞭望”2002 年有关中国发起运动对付法轮功的报告所指出，“数百年来，中国的统治者都是把领导人魅力、组织力强及对群众吸引力大的运动视为最大的政治威胁。”<sup>18</sup>

即便如此，比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和文化大革命的残酷镇压，政府对宗教信仰的态度还是温和多了。据估计，今天在中国有 6000 万基督徒（中国共产党有 7100 万党员），同时每年都有更多新成立的教堂。中国比任何国家出版更多的圣经（1980 至 2005 年之间印刷了 4000 万本）。近年来，有好几十家民营的基督教新书店在各大城市开张。佛教也在中国复苏，人们重新开始追求一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完全被消灭的精神生活。今天，中国仍然监管宗教或半宗教团体，这倒不是因为对宗教有特殊的敌意，而是因为惧怕这类组织的发展可能会对共产党的权威或合法性带来挑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越是坚持实施不民主的作法，宗教组织和信仰就越有可能发展壮大以填满这个真空。

---

<sup>17</sup> 请参看 <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5/61605.htm>。

<sup>18</sup> Mickey Spiegel, “Dangerous Meditation: China’s Campaign Against Falun Gong（危险的默念：中国对付法轮功）,”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2002), p.1。

## 合法性和贪污腐败

中国的第四代领导人<sup>19</sup>不能像第一代领导人一样，依靠由革命斗争争取来的合法性。他们也不能从第一代领导人所选定的，或是遵守共产党的教条（第二和第三代领导人都先后这么做）而获得力量。中国的领导人无法宣称自己是经由民主渠道得到了民众的委任。二十年前在一级乡村开始的直接选举并没有在更高的层次得到采纳，而这更高的层次才是真正权力（特别是预算方面的权力）的所在<sup>20</sup>。中国的领导人把希望寄托在持续的经济发展上，同时小心翼翼地利用民众对民族主义的诉求，加上压制的方法，来保护中国共产党所享受的权力垄断。这更好地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如此强调要确保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来使中国可以继续推进经济现代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有时候会利用煽动民族情绪，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中国的领导人希望可以避免像苏联以及受到“颜色革命”影响的前苏联国家一样的命运。

要做到这些，中国的领导人就必须能够更好地处理日趋严重的腐败问题。中国的民众把腐败列为他们对政府的最大抱怨。虽然中国人很少遇到在某些社会里出现的腐败现象——如贿赂交通警察或花钱打通渠道以取得电话服务——但是腐败仍然侵蚀了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比如养老金被盗窃、公款被滥用、环保法被违反，而违法者却逍遥法外等等。“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2006年的“清廉指数”报告把中国排在159个国家中的第70位。报告指出：经济改革，包括私有化，为官员提供了数不清的贪污机会。胡锦涛主席于2005年1月份告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贪污腐败是威胁共产党继续执政的最大因素。他承诺将非常认真地“逐步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中国共产党于2005年处分了11.5万名犯了贪污和有关违法行为的党员，把1.5万起案件移送刑事法院起诉，并追回了价值3亿美元被滥用的公款。在利用反腐败运动方面，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战略上巩固了民众对他们的支持，在战术上惩罚了对手或是为自己想提拔的人清除了晋升的障碍。2006年，在一个备受瞩目的动作中，上海市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因为滥用

---

<sup>19</sup> 第一代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及刘少奇——一般说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政治领导，同时也是国共战争时的军事领导。第二代的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及赵紫阳——一般在革命时期地位较低，但却是文革之后改革开放的建筑师。这一批领导人中有许多到过海外留学。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及李鹏——没有参加过革命，在中国和苏联分手前上大学念书。他们有许多学的是工程，而且大部分是在前苏联学习。胡锦涛、温家宝及曾庆红代表第四代的领导人。他们是在20世纪40年代出生，在中国求学，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有间断。目前还未登上高层位置的第五代领导人，有少数几位是在美国或西欧留学过。与上几代相比之下，他们大部分不是工程师，而是拥有法律、金融、商业及政治学背景的人士。

<sup>20</sup> 中国人大在1987年通过了一条法律，让“村民委员会”可以通过不记名投票方式直接选出。这个委员会填补了文革后人民公社解散的真空。委员会一般是监管一个农村的行政事务，包括预算管理、公共设施、争端解决、公共安全、社会秩序与安全、卫生问题及地方营业管理。一个大的农村可以有一万多村民，小的可能只有好几百位。一般的农村大约有一千至两千居民。正式的政府从北京只延伸到在组织上是在乡村以上的市镇。

养老保险金而下台。他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提携的人，也是江的上海同乡，是十多年来被革职的级别最高的共产党高级官员。

本工作组认为在中国高层腐败是普遍存在的，而要减少腐败就必须要有新的、独立的调查机构和自由的新闻媒体，它们本身不腐败，也不怕官方的恫吓。而且，虽然法院高层努力要进行改革，中国还要致力于发展一个独立的，受到专业训练的，不受到政治操纵和不搞个人关系的司法系统，才能保证有效地打击腐败。在这方面，非政府组织可以在培训律师和法官方面起重要的作用。中国的领导人感到进退两难的是，虽然他们知道需要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可是他们不可能建立一个与中国共产党竞争的机构。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抉择。他们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倒不是因为美国要他们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们权衡了什么是能让稳定、发展以及对政权掌握持续下去的最好办法。

## 中国领导人的反应

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国家面临许多挑战，同时他们政权的合法性也面临威胁。他们的回应是改革和压制双管齐下。大部分的改革是发生在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方面，同时法律制度的各个方面也开始受到注意。

### 改革

中国政府于 2004 年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社会经济倡议，“建立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是照顾贫困工人、失业者及老年人的需要。倡议的总目标是重新调整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方向，以取得更大程度的平等和可持续性。该倡议中的一个重点是在 2005 年消除所有的农业税。另外一个优先事项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这个“和谐社会”项目的影响力到目前为止还很有限，但是中国的领导人承诺要坚持下去。在 2006 年的人代表大会的前夕，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了一个“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式，并宣布制定计划建立一个新的农村保健合作体系，使 7 亿农民在 2010 年之前能够有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险。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也向不发达的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投资。2000 年发起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在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及云南这些省份刺激了经济发展。从 2005 年开始，这个战略与开发东北地区并驾齐驱。而东北是旧的国有重工业基地。在“振兴东北”的旗帜下，中国在过去被称为“铁锈地带”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这些省份投入了 70 亿美元，修筑新公路和高技术研究基地。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倡议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赞助的基础设施项目。值得注意的事，虽然两者都是大规模的项目，比起每年流入中国数目达 600 至 700 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还是小巫见大巫；而这些外国直接投资大部分都是投入到沿海省份的项目。

环境保护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忽略之后也开始受到了重视。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绿色”倡议，包括三北防护林工程、自然保护区森林保护项目以及湿地恢复项

目。这些和其它类似的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例如，中国已经成为首先使燃料脱铅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同时在接受严格的节省燃料和欧洲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的速度上超过美国。但是一心一意要持续发展经济的地方当局却无意实施中国新的环境标准，他们在执行方面也是非常怠慢。而且，发展带来的负面后果仍然远远超过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

虽然中国的许多改革还是着重在经济方面，但有一些已触及到了敏感的政治和法律范畴。虽然中国的刑事司法体系仍然存在重大问题，中国已经废除了“收容遣送”的做法；过去警察经常根据这种做法把非法迁移到城市的农民逮捕和虐待。中国也开始对源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劳改拘留制度进行辩论。一些知名的中国法律学者呼吁废除劳改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一个人可以在没有经过正式起诉或被判刑事罪名成立的情况下被拘留长达三年。<sup>21</sup>中国的最高检察院在 2005 年所进行的对刑事司法体系的调查中发现了 3700 起官员滥用权力案件，包括对囚犯施与酷刑、非法拘留或虐待。北京承认逼供曾经导致无辜的人死亡，甚至承认被处死的犯人的器官被采收和售卖。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否认这种做法。调查本身已不寻常，而发表这种令人尴尬的报告更是如此。此报告出台后，中国政府于 2006 年 11 月份宣布最高法院在未来将审议所有的死刑案。中国司法制度的其他方面也在经历重大的改革，包括司法体系更加专业，为公民提供可以控告政府非法行为的渠道、建立一个让政府的信息更公开的制度以及对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技术问题进行试验。

中国政府似乎在治理方面最不愿意考虑基本的改革。在中国共产党内，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展开的政治改革的精神现在奄奄一息，预料在 2007 年召开的第 17 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也不会复苏。当改革的提倡者赵紫阳总书记因为谴责六四天安门大屠杀而在 1989 年 6 月 25 日被逼从领导位置下台并受到软禁时，政治改革就已偃旗息鼓了。今天，大学校园已经不再是激烈辩论政治的地方。在党外，共产党制度批评者（像目前主持一个广播节目并在香港负责一个工人权力团体的前天安门工人领袖韩东方）也趋向呼吁中国按照现有的法律给予工人应享有的权力。他们不主张推翻现有的政权，而且这样的想法也可能很难得到群众的共鸣。

只有香港的居民，在享受到广泛政治自由的同时继续在推动政治改革。在民众的压力下，（最近在香港的首届最高行政长官的竞选中重新当选的）曾荫权宣布他支持香港基本法的改革，以便能最晚不迟于 2012 年，通过普选的方式直接选举最高行政长官，届时他五年的任期也将结束。

*本工作组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了解中国所面临的许多挑战，同时正采取步骤处理像经济差距，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司法改革及环境之类的问题。但是根据美国立法议员们本身的经验，在这些领域中所面临的公共政策方面的挑战是庞大的。到目前为止，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可能缺乏体制上的能力来制定和实施所有需要进行的改革。*

---

<sup>21</sup> 例如，请参看 Liu Renwen, *Criminal Policy* (刑事政策) (Beijing: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2004)。

虽然在党内有可能对扩大“民主”进行实验，虽然香港仍然是在中国境内的民主堡垒，虽然许多外国分析家的结论认为自由的新闻媒体、更大的透明度及独立的司法制度能够改善政府的效率和减少贪污腐败，本工作组认为没有证据显示中国会在近期内进行重大的民主改革。

## 镇压仍然普遍

中国的统治者反复表明他们愿意使用独裁制度的各种工具来限制对他们权力的挑战。正如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于 2005 年发表的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所指出，“中国密切监视各种政治活动并以模糊的国家安全法规作为依据，拘留和监禁那些从事未经党批准的政治活动的人。”<sup>22</sup>例如，当中国民主党于 1998 年出现时——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有人为争取反对党的合法地位而做出努力<sup>23</sup>——该党的领导人遭逮捕并以颠覆罪被判刑 13 年。估计大约有 850 名中国人因政治罪名被监禁。就连那些试图在中国公民社会范围内活动的人有时候都会触犯有关当局。在胡锦涛的任期内，有一些环境和公共卫生的活跃分子被监禁，另外还有许多人因为批评政府官员，导致官员难看，也受到恫吓。

特别是在地方一层，官员们在使用粗暴的镇压手段方面并没有收敛。2005 年 12 月在广东省的东洲，警察以暴力镇压了一个反对建立当地发电厂的抗议活动，杀死了好几位手无寸铁的平民。面对全世界的谴责，中国国家当局进行了干预，最终逮捕了负责下令开枪的当地官员。在 2005 年发生的成千上万的社会动乱事件中，东洲事件之所以显得突出，是因为事件导致严重伤亡，而已知的大量伤亡事件为数并不多。而且，有意义的是，东洲的村民向当地的官员提出索赔，告他们无视或违反了中国的政策与习惯做法。他们不是向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挑战；但是，发生在东洲的事件生动地表明，在中国，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还是相当有限，而那些越过这种限制的不是受到恫吓就是被逮捕，甚至遭遇更坏的下场。

## 控制信息

除了围堵可能会威胁到中国共党政权的活动，中国政府还加紧控制国内信息的流通。中国没有一个自由的新闻界，且所有的媒体出口都受到中国政府的政治控制。中国检查国际新闻杂志，检查像台湾这样敏感议题的报道内容，有时候甚至删改文章，并且管理互联网上的政治内容。为此，中国政府雇用了 3 至 5 万名甄别、审查、删减及调查人员。当谷歌中国（Google.cn）于 2006 年 1 月 27 日在中国揭幕

---

<sup>22</sup>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2005* (2005 年世界自由报告),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 145.

<sup>23</sup> 从 2005 年开始，美国国务院的国别人权报告估计有 500 至 600 人因为表达非暴力的政治意见而在“反革命活动”的罪名下被监禁。该罪名目前已被废止。同一份报告也提到非政府组织估计另外有 250 名人士因为参加了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政治活动被监禁。另外还有几千人也因触犯国家安全法而被关押。

时，谷歌同意限制搜寻结果，这样包括像宣传法轮功或探讨 1989 年天安门大屠杀的网页就无法出现。中文版的维基百科（Wikipedia）也遭遇到同样的信息控制。

但是一旦进入了千千万万个人们讨论现代问题的网页后，就会发现大家无所不谈，内容包括韩国的流行偶像、达赖喇嘛、官员腐败及台湾的未来这类敏感的问题。中国人绕开信息控制的能力要比政府的调控信息的能力发展得更快。中国的精英学生特别擅长规避信息控制。一位上海复旦大学的中国研究生曾经自豪的对一位到访的 [美国] 参议员（此参议员因无法在互联网上找到一则西方的新闻感到沮丧）说，“参议员先生，您若愿意，我可以帮您找到。”

通过外界施加压力使中国当局放宽一些对媒体的控制是有可能的。例如，在 2008 年奥运会到来之前这一段时间，中国承诺不对报导奥运的外国记者加以限制。后来，国际奥委会敦促中国履行承诺，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 2006 年 12 月 1 日宣布，从 2007 年 1 月 1 日开始，至 2008 年 10 月份为止，外国记者将不再受到繁琐的旅行限制和其它妨碍。原则上新的规则在奥运会之后就不再有效，但是要把它们撤销可能不那么容易，特别是 2010 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接着就要举行。

*总的说来，本工作组认为，中国试图控制流入国内的信息或是控制国内流通的信息，这和它扩大互联网和其它媒体的信息渠道实在不一致。特别是互联网，它已经是政治议题的信息来源和传播渠道。就算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会尽极大的努力，但互联网还是有可能成为中国人民寻求政治改革的一个虚拟论坛。*

## 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底线

中国存在的种种障碍使得准确判断中国的未来非常困难，但是本工作组得出的结论是，在未来的 5 至 10 年内，中国国内的挑战不太可能会使经济增长停滞或让中国经济偏离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而且，可以威胁到中国政府生存的组织目前并不存在，也不太可能出现。事实上，大部分的中国人认为中国目前的方向是正确的。一个 2006 年进行的佩尤民意调查（Pew Research）发现有 81% 的中国人认为他们对现况感到“满意”。这个数字在 2005 年是 72%，在 2002 年是 48%。

自我保护很有可能促使中国的领导人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公民空间，进一步减少动乱发展到可以威胁共产党控制的可能性。如果因为严重的环境因素和人口问题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慢了下来，那么威胁政治稳定的最严峻挑战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国家如果有 19% 的人口，也就是 2 亿多人不表示“满意”（他们可能是不满，或至少是模棱两可），动乱的可能性便显而易见了。

*本工作组认为，中国需要建立更稳固的体制—一个专业的、独立的司法与仲裁体系、更自由的媒体及更有回应和负责任的政府—才能成功地同时应付许多国内的挑战和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竞争压力。要让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发挥功能，这些体制显然重要，而中国如要寻求创新，发展高技术，高知识型的产业，这些体制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在处理所面对的社会、政治及经济挑战时，中国现任的领导人似乎并不认同中国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和更进一步遵守国际人权准则。中国总的人权纪录仍然很差。但是，本工作组相信，扩大美国与中国的合作，不仅能使中国更成功地应对其艰巨的国内挑战，也能使与美国国内和中国国内商业界、非政府组织、智库、大学、国际团体以及从事民间活动的人士有机会促成一个更民主、更开放及更负责的体制在中国出现。

# 中国如何面对世界

许多中国人把 2008 年夏季奥运会视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一件盛事，因为没有其他事件能像这场奥运会一样象征一个王国在宇宙中终于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在忙着准备迎接奥运的同时，中国的对外政策也相应调整，目的是要恢复其在亚洲和其它地区的影响力并能受到尊重的地位。正如中国的经济与社会转型及奥运会场的兴建是一项在进展中的工程，北京的对外政策也是如此。

中国的外交事务向来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sup>24</sup>。这五项原则是周恩来总理于 1953 年 12 月首次制定。情况对中国有利的时候它们会被遵守，没有必要的时候它们就被摆在一边。今天，这五项原则已经较少提到了，但是还未完全被丢弃。中国骄傲的引用这五项原则来说明它与东盟邻国的关系，也以五项原则作为它拒绝其他国家实施制裁的理由，因为中国认为这些制裁是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预，即使在极端的情况下，如苏丹达尔弗尔发生大屠杀之后，中国也如此认为。

但是中国现行的对外政策更多考虑的是现实的需要，而不是对原则的忠诚。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正在扩大，北京的外交也越来越倾向积极接触和自信坚定。中国现在谈到要创造一个“和谐世界”，承认中国的利益也是全球性的。中国面对世界的方式包括努力促进多极化，目的是削弱它所认为的美国霸权主义。但是中国的外交也包括向其邻国不断保证它的和平意图。中国面对世界的方式集中在三个广泛的目标上：

- 与美国建立合作性关系，同时防止任何针对中国的联盟出现；
- 在中国外围建立一个“和平区”，让中国可以一面实施其国内的议程，特别是加强经济实力方面，又可以一面扩张它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 确保获得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供应）并使其来源多元化。

中国的领导人仍然认为台湾问题是内部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显然包括对外政策方面的考虑，特别是美国及其亚洲盟友在台湾问题上的作用。

中国的对外政策带有情绪化和紧迫感的原因是中国希望重新恢复受到别国尊重的大国地位，同时也希望洗刷掉西方和日本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所带来的“世纪耻辱”。但是中国的雄心还不仅是恢复它在东亚的地位；中国作为奥运东道主这一点体现了中国的一种新的爱国主义精神——充满自豪、有竞争力、走向世界。

## 中国与美国合作并同时制衡美国

---

<sup>24</sup> 五项原则是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



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要确保中国的经济健康发展和国家安全，中国必须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因此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的特点正是扩大与美国合作的领域。正如胡锦涛于 2006 年 4 月访问华盛顿时所说的，中国与美国“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战略利益，在互利的合作上有广阔的前景”。同时，中国的领导人对他们所认为的美国霸权主义越来越不满。凭着自身的努力，他们在全世界建立了自己的经济、政治及安全网，借此在亚洲和其它地区抗衡美国的影响。中国提倡建立“纯亚洲”的团体，在东南亚、非洲及中东地区展开外交攻势，与俄罗斯扩大军事关系，并反对加强美日联盟在东亚安全事务（特别是台湾）的作用；这一切反映了北京正在努力保持一个和平区域，让中国可以在经济势力不断扩大的同时也能够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同时也防范任何由美国带头的反华联盟的出现。中国相信这样双管齐下——合作加制衡——是最有可能创造让中国能够继续发展经济和确保安全的条件。

## 和平区域

中国外交最重要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和平区域，让中国可以在和平区域内继续发展其综合国力。过去 20 年来，中国不是正式解决了与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就是把几乎所有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搁在一边”（中国与俄罗斯、印度、越南及另外五个南中国海领土权的要求方有领土争端问题），并与像韩国这样过去的对手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中国过去支持在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及缅甸境内的革命运动，现在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现任政府发展了坚实的经济、政治、甚至安全关系。

在与国家群体合作解决共同问题时，中国越来越顺手，也不再担心“小人国”一心一意想束缚住格利弗[译者按：源自《“格利弗”游记》]。最能说明中国在多边环境中信心加强的是 2006 年 10 月 31 日在中国南宁举行的中国与东盟正式建交 15 周年纪念峰会。峰会的联合声明着重于经济整合，但是中国也利用峰会推动一个更大的议程。温家宝总理告诉与会的领导人，在反恐、海上安全和其它跨国犯罪的问题上，应该“促进军事对话与交流，开展机制化的防务工作”。

中国虽然在国际舞台上信心增加了，邻国也对它表示欢迎，中国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北京希望在本地区占突出地位的雄心受到邻国的挑战，邻国或通过像东盟这样的组织，或单独采取措施（通过它们的安全政策，包括与美国结盟），以确保能避开危险，因为它们毕竟对中国的真实动机仍不确定。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对中国在经济和安全方面发展的全面含义做出评估之后显得很担忧，他们的首都也感受到一种普遍的不安。由于注意到了这种不安，郑必坚，这位胡锦涛主席具有影响力的顾问，在 2003 年用“中国和平崛起”一词来形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通过在美国外交季刊 2005 年 9/10 月号发表的一篇文章，郑必坚让西方的观众对该词更加熟悉。西方对该词的翻译至少有三个缺点：首先，英文方面的表达立刻让人想起大国的“兴起与衰落”，从而暗示了美国的衰落。此外，人们不禁会问，“就算中国是和平崛起，但之后呢？”最后，一些中国国内的批评者指出，承诺中国和平崛起

可能会削弱制止台独的努力。中国的领导人注意到了该词的政治包袱，因此暂时把它摆在一边而改用“和平发展”。其实，这两个不同的词概念是一样的。

*本工作组认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焦点是在近期至中期确保获得和平环境所需的条件并保持这样的和平环境，使中国国内可以在经济与社会方面求发展。中国希望避免冲突。这个焦点使美国有机会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共识，并在对两国都重要的全球问题上（如反恐战争、核扩散及环境保护等）采取具有互补性的政策，甚至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伙伴关系。*

##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在中国利用外交手段安抚并向邻国示好的过程中，日本显然不在此列，尽管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相当牢固。在中国境内有 2.5 万多家日本企业，单在大连这个海港城市就有 2 千家。中国与日本也是主要的贸易伙伴。

尽管两国的经济关系不断发展，政治关系几年来却非常冷淡。这不仅对北京和东京造成问题，对美国也造成问题。除非中国对日本以及日本与美国的联盟关系泰然自若，美日联盟很难全面发挥其全球和平与安全作用的潜力。

中日之间的困境与尊严感和恐惧感有关，也与双方竞争领导权和影响力有关。若将民族主义的定义放宽，那么可以说民族主义正在两国抬头。中国正在提高军事预算并且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与此同时日本也在考虑修宪并使军队升级以便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起更大的作用。两国之间的紧张自然难免加剧。最近几年，中国的反日言论大部分集中在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到靖国神社参拜这件事上，而靖国神社是祭祀日本战争亡灵的地方，包括 14 位二次大战“甲级”战犯的亡灵<sup>25</sup>。北京也抗议日本的教科书对 30 年代和 40 年代日本在中国的暴行轻描淡写。最后，美日在台湾政策上越来越协调也让中国感到关注，这也成为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主要障碍。正如中国一位著名学者所说的：美日联盟使这一线希望破灭了<sup>26</sup>。

日本注意到了中国快速进行军事现代化，也为此越来越感到恐慌。日本抗议中国在东海咄咄逼人的军事姿态，在那里中国在有争端的海域附近开采海底石油与天然气，使原来并不相干的、长期存在的钓鱼岛领土争端更显复杂。日本也批评中国的人权纪录差，并认为北京故意挑起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由于缺乏真正的和解，根深蒂固的相互猜疑将继续在中日两国的人民与政府间存在。

---

<sup>25</sup> 小泉改变了他的前任有关到靖国神社参拜的政策。参拜神社于 1979 年首次在日本的对外关系中造成问题，因为有消息传出有 14 位曾经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列为甲级战犯的日本军官在 1978 年秘密地在那里被祭祀。神社的英文版网页为日本在二次大战战前战后的行为申辩，“战争确实是悲惨的，但日本是在为了顾全国家的独立与和平，为了全亚洲的繁荣不得已卷入了冲突。”

<sup>26</sup> Wu Xinbo, “The End of the Silver Lining: A Chinese View of the U.S.-Japanese Alliance (一线希望破灭了：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美日联盟),”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6.

但是现在两国的关系出现改善。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上任不到两个星期之后就决定于去年十月访问北京并与胡锦涛会面。两国元首的峰会非常成功。重要的是安倍对靖国神社的立场是“不确认也不否认”。他拒绝表示他是否在2006年初以内阁官房长官的身份到那里参拜过，也不说明他是否会以首相的身份再去参拜。北京曾把改善关系的条件定为，日本能令人满意的作出保证，安倍将不去靖国神社参拜。但在日本，许多安倍的支持者敦促他要步小泉的后尘继续到靖国神社参拜，或最起码不能否认他有参拜的权利。虽然安倍的“不确认也不否认”答复不完全满足中国的要求，但胡主席还是接受了他的答复，认为这毕竟是前进了一步。安倍与胡还宣布建立一个探讨历史问题的联合学术研究小组，同时表示支持舰船互访和其它消除紧张、建立关系的步骤。领土争端问题将不容易解决，但是一个能够把主权问题暂时摆在一边而致力于建立共同经济发展的方案可能会为两国提供一个向前走的机会。在民间方面，两国之间的旅游、留学及文化交流欣欣向荣。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该峰会有一个推动力也可能是因为两国共同关注北朝鲜的核问题。安倍从北京飞往首尔的路上北朝鲜进行了核试验使这一点更为突出。

*本工作组预测，中日经济关系的积极势头加上最近恢复的经常性高层对话将在未来几年逐渐地减少紧张局势，但明显的是两国的关系将很容易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的领导人有时候觉得有必要跟日本打“历史牌”或“民族主义牌”，将来他们也会继续这么做<sup>27</sup>。北京尖锐地反对日本寻求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反映了这一点。同时，日本与中国尚未解决日本在二次大战的罪行与暴行等敏感问题（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往往冲淡或掩盖日本军事暴行、“慰安妇”等问题），也未解决在东海的领土争端。而且，两国的安全关系也刚刚起步，它们可能相信保卫自己以防范对方的潜在威胁是势在必行的。最后，中日关系有可能在解冻后再倒退，因为双方对如何最好地挫败北朝鲜的核野心有不同的优先顺序和分歧。*

## 中国与台湾的关系

台湾仍然是东亚一个潜在的爆点。它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唯一考虑到武装冲突并认真做准备的问题。美国的对台政策在美中的“三个联合公报”和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中有清楚的说明。三个联合公报确立了美国支持“一个中国政策”<sup>28</sup>并要求美国根据海峡两岸紧张的缓解而逐渐减少对台军售。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将保持一种独立的能力，以“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欲诉诸武力的或其它强制形式的做法”。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美国也有义务“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品和防御服务”。中国认

---

<sup>27</sup> 北京可能在2005年4月份学到了一些教训。当时政府煽起的反日示威一发不可收拾，造成骚乱和极大的经济损失。

<sup>28</sup> 美国历届政府、国会、官员对“一个中国”有许多不同的定义。大部分的定义包括三个核心内容：1)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美国不与台湾保持正式关系；2)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台湾加入其成员国是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3) 美国不反对中国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并且可以接受统一，只要是和平方式实现。有关“一个中国”政策的详细讨论请参看 Shirley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中国/台湾：“一个中国”政策的演变),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6。

为美国对台湾这些安全的承诺，特别是向台湾提供防御物品和服务，是对中国内政的侵扰，是中国不能接受的。和 35 年前一样，台湾今天仍然是中国领导人最关注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在思考中美关系时一直把台湾放在心上。

在 90 年代中期，中国曾经一度尝试制定统一时间表，但后来放弃了，同时也放弃了与统一时间表有关的，在台湾对岸进行的一些更具有挑衅性的军事演习，转而采取长期的策略来压制台独情绪、让台湾在经济上与大陆牢不可分并瓦解华盛顿对台湾的支持。中国仍旧采用一些对台湾有胁迫性的手段，例如在台湾对岸快速部署大量导弹。只要台湾避免走向正式独立，中国目前似乎可以接受让台湾保持自治。在 2005 年的春天，中国通过了一个标志性的法律文件，即“反分裂法”，该法要求在某些条件下对台湾使用武力<sup>29</sup>。但同一个法律也包括了和解性的语言，主张与台湾进行“平等的”对话和“方式灵活多样的”对话。在此法通过后的几个月，北京接待了一系列的台湾“泛蓝”反对党领袖，给与他们红地毯式的待遇。中国今天的做法是讨好国民党的政治人物（他们赞同最后与一个民主和繁荣的大陆统一），进行经济与文化整合及不时地向支持台独的势力进行心理恫吓，同时加强军事能力以威慑台独势力并能够在外交手段失败时攻击台湾。

陈水扁总统和所属的支持台独的民进党于 2000 年上台之后，台湾的大陆政策有了重大的改变。于 2004 年险胜而再度当选之后，陈水扁（与他的前任李登辉一样）继续坚持台湾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民众不支持陈水扁通过修宪走向法律上的独立。另外，由于受到贪污丑闻的影响，加上越来越壮大的泛蓝反对派联盟控制着立法院，陈水扁的执政可谓步履艰难。台湾政治体系的制衡作用也让民进党特别不容易进行修宪或采取其它可能会给台湾的政治地位带来危机的步骤。泛蓝的反对与泛绿在立法上的失误使民进党大多数的政策倡议被挫败，包括陈水扁希望与美国完成的一笔高达 180 亿美元的军售交易。该交易是布什政府于 2001 年首次授权进行的，但现在无法进行下去。

### *挡不住的一体化？*

海峡两岸在政治上趋向缓和的语气反映了两个社会之间的经济往来生气勃勃，同时也持续不断的接轨。两岸双边贸易现在已达到每年 650 亿美元（完全对台湾有利）。台湾的公司在大陆的投资超过了 1000 亿美元，虽然台湾对先进技术转移到中国这一方面有相当大的限制，但台湾的公司还是把一些敏感的高科技转移到大陆。超过 120 万的台湾公民——几乎是台湾 5% 的人口——住在大陆。两岸通婚也越来越普遍。北京与台北同意作出一些实用的安排，例如允许两岸有更多的直飞包机，并同意增加人道和经济交流。走向整合的趋势似乎势不可挡。

---

<sup>29</sup> 于 2005 年 3 月 13 日通过的反分裂法的第 8 条说明：“‘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处的英文翻译是根据中国使馆网页所登录的内容，可从 [www.china-embassy.org](http://www.china-embassy.org) 获取。

尽管中国担心陈水扁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会想办法把台湾推向独立，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似乎很小。实际上，今天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是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最缓和的。这说明了北京在战术上的改变，民进党的政治麻烦及华盛顿“双方克制”政策的稳定作用，因它一方面遏制了中方用武力威胁台湾，同时也反对台湾走向独立。但是两岸的关系目前并非静止稳定。北京仍然致力于最终的统一目标，而且不排除使用武力来达到目的。台湾的人民则认为没有理由要求他们放弃现有的自治与民主去接受北京的统治。民意调查不断显示台湾大部分的人民希望保持现状，最起码在可预见的将来保持不统不独。在近期内解决台湾问题是极不可能的，而且也不能排除美国会卷入任何冲突之中。

*本工作组认为，美国根据三个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所作出的承诺在保持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有实际意义的贡献。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认为华盛顿致力于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是美国重视东亚战略利益的象征，因此在这方面的利益只要稍微放松就会引起关注。但是，当华盛顿与北京都表示有权力使用武力来防止在台湾海峡发生大家不想见到的结果时，美中的双边军事关系，甚至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就会很自然地受到限制，双方也会认为有必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这种严重相互矛盾的军事目标本身就会造成极度的不信任，而且有可能演变成双方意想不到或不愿见到的冲突。因此，在海峡两岸达成某种程度的政治妥协，即使是临时性的政治妥协之前，华盛顿与北京虽然不能解决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但仍须继续谨慎地处理这个分歧。*

## 确保获取自然资源

中国对外政策的第三个主要目标是确保获取推动经济成长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并使其来源多元化。能源问题已经成为这个目标的典型部分。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耗仅占美国的九分之一，但是因为人口众多和在节省能源方面效率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同样是生产一美元的GDP，中国使用的能源是日本的九倍。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对进口石化燃料的依赖还会增加。中国目前依靠美国所提供的“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安全海上航线来进口大部分的石油与天然气。它通过供应商多元化和建立可以经得起外部压力的商业和政治（有时候包括令人唾弃的政权）关系来减少这种依靠。中国正在扩大本身的深海海军能力，令人不禁觉得，将来有一天中国会建立起一支独立的防守关键海上运输航线的舰队。

中国对能源的探求在多方面影响了它的对外政策。冷战结束后，中国发起了“上海五国”（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塔吉克斯坦）来扩大它在中亚的影响。中国希望不仅能打开跨境贸易和投资，还可以保证中亚国家不给维吾尔族分裂分子提供支持或庇护。继乌兹别克斯坦于2001年加入“上海五国”之后，该组织被改名为“上海合作组织”，并仍旧在中亚地区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及极端主义”。现在中国更进一步寻求上海合作组织协助它掌握石油与天然气的合同及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境内的输送管道。

中国目前已经越过了边界，在境外寻求原材料，特别是能源。中国扩展到非洲，是为了将来可以获取原油、铜、锡、木料及其它关键物资。中国这样的做法是多方面的，有经济也有安全的一面。中国最近的闪电行动重新体现了中国大航海家郑和的精神——郑和在将近 600 年前的明朝，就率领商业与探险船队抵达印度洋和非洲东岸。从 2000 至 2005 年，中非的双边贸易翻了两番，达到了 400 亿美元，使中国成为继欧盟和美国之后的非洲第三大贸易伙伴。安哥拉于 2006 年代替了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目前有超过 8 万名中国人居住在非洲。来自北京的高层代表团 2006 年不断地带着支票本访问非洲。胡主席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之后已经三次访非。

中国向非洲扩展的其中一个表现是非常积极地向非洲提供安全援助。除了建立经济关系，中国也提供军售。苏丹、尼日利亚及津巴布韦是最大的买家。中国也派遣部队参加在非洲的国际维和行动。在 2007 年初，中国就有 1300 名军事人员被调派到利比亚、刚果及苏丹南部。

非洲的领导人对中国向非洲发展大都表示欢迎。在 53 个非洲国家中有 48 个参加了于 2006 年 11 月举行的中非峰会。在这三天的会议中，中国寻求获得了它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源，同时承诺加倍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与投资<sup>30</sup>。

但是中国对非洲的兴趣也引起了一些非洲东道国的批评，甚至不满。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于 2006 年 12 月就警戒其他的非洲领导人要保持警惕，不要落入与中国建立“殖民主义关系”的境地，那样的话，由非洲输出的原材料就会再以成品的方式进口到非洲。

## 中国不附带条件

中国几乎“放手不管”其贸易伙伴的内部事务，也就是完全不讲政治条件。中国的说法是，求发展就需要有正确的优先顺序，首先是搞经济改革，（如果有需要的话）再慢慢地谈政治自由。北京利用这种判断来说明它所使用的发展手段的正当性，而这种手段正巧与中国本身的贸易优先和政治选择相互吻合<sup>31</sup>。

中国的“不附带条件”手段并非特殊。许多其它的国家，包括美国，也经常为了其战略利益而把在人权方面的关注作为次要。但是中国与像苏丹、安哥拉及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建立经济关系，给与援助及进行军售使它与美国、八国集团其他的成员国及国际金融组织不合拍，因为它们希望把援助与投资作为一个国家打击腐败和总体改善治理方法的条件。中国在遵守国际借贷标准上不积极，等于是让像苏丹、津巴布韦、伊朗及缅甸这样的国家可以避开外国金融压力或多边制裁机制的影响。例

---

<sup>30</sup> 唯一五个被邀请但没有参加的是布基纳法索、马拉维、甘比亚、斯威士兰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它们都是在外交上承认台湾的国家。

<sup>31</sup> Elizabeth Economy and Karen Monaghan, “The Perils of Beijing’s Africa Strategy (北京的非洲战略危险重重),”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2, 2006.

如，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努力将反腐败措施作为减轻债务的条件，中国在最近仍然向安哥拉放贷达 20 亿美元。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经常反对以人权为理由制裁一个国家，这不仅是因为它害怕有一天自己也会受到制裁，也是因为中国作为国际能源舞台上的一个较迟登场的角色，深知自己不能对能源丰富的不发达国家的人权表现太挑剔。而且，中国批评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使用双重标准——一方面无视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及利比亚的反民主和人权差的情况，并拿着“祖父条款”对美国在缅甸的石油与天然气投资网开一面，另一方面却又要求中国向苏丹这样的国家停止投资。最后，中国总是对美国带头的制裁做法表示不满，认为那是令人不能接受的美国霸权主义的表现。

*本工作组认为，中国“不附带条件”的投资与援助削弱了国际社会把改善治理作为获得援助条件的努力，也阻碍了国际社会惩罚像苏丹这种行为恶劣的国家。除非北京的领导人认识到他们这种行为基本上破坏了中国本身的利益，包括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或是中国本身的国际形象，否则中国可能不会停止利用自愿制裁机制所提供的经济与政治机会，即使这样做会引起华盛顿的反感。*

在这方面，伊朗可能是中国不断演变的国际行为的试金石。当美国反对中国向伊朗出口巡航导弹，向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同时向中国政府最高层提出这个问题时，中国最终停止了出口。今天，美国与欧洲和其它国家在努力约束伊朗的核野心之同时，可能也需要说服中国权衡一下自己的利弊，一方面是中国的能源和地理政治的利益（中国从伊朗进口百分之十的石油，同时由于伊朗在中东很有影响力，中国历来试图与伊朗缔造紧密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美国与欧洲盟友所支持的不扩散目标，加上中国本身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这个核心国家利益<sup>32</sup>，这两面中国必须权衡。

---

<sup>32</sup> 有关中国与伊朗的关系，包括中国支持伊朗的军事与石油工业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深入讨论，请参看 John W. Garver, *China and Iran: Ancient Partners in a Post-Imperial World*（中国与伊朗：后帝国主义世界里的古老伙伴）(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受到两个因素推动：一个是明确的作战目标（台湾），另一个是明确的战略目标（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强国，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军队）。2005年，美国国防部就中国军事状况向国会汇报，发现中国的准备重点是在中国的周边，特别是东海和南海一带打赢时间短、高密度的战争，因为那里存在长期的领土争端，冲突有可能一触即发，同时该地区的贸易航线也日益重要。从较长期来看，其他因素也将影响中国的军事战略，包括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与日俱增，中国西部与东北部边界所存在的不稳定政权和北京长期对美国带头的遏制战略给予的关注。美国国防部在2006年发表的四年一度国防审议中作此结论，“在主要的崛起的大国中，中国最有潜力成为美国的军事竞争对手，同时也最有潜力部署破坏性的军事技术，削弱传统的美国军事优势<sup>33</sup>。”2007年1月，当时的国家情报办公室主任约翰·尼格罗蓬特在国会作证表示，中国渴望登上大国地位是它进行现代化的动力，即使台湾的问题解决了这种情况也不会改变。

中国渴望成为大国的一个表现就是积极进行航天项目。中国于2003年成为第三个把人送上太空的国家，此外北京已经制定目标要在2024年把人送上月球。中国在航天系统上的投资——商用航天发射工具、监视卫星及电信卫星——都可以两用。2006年发表的四年一次的审议报告指出，中国的航天、航空及导弹能力已经可以对中国周边具有争议的地区的潜在对手起威慑作用。中国似乎是有意要证明外界的这一关注，在2007年1月11日使用导弹摧毁了一颗属于中国的近极地轨道的旧气象卫星。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地测试反卫星系统。只有俄罗斯和美国过去测试过这种能力。美国最近一次的试验是在1985年。

中国的反卫星试验突出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缺乏透明的现象。中国的外交部在试验进行一个多星期后才对有关这方面的询问做出正式答复，而中国的动机至今还是无从揣测，结果引起了外界多方面的解释：中国这么做可能是过份低估了国际社会的反应，可能是中国机构间沟通失败，可能是促使美国支持正在日内瓦进行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PAROS）<sup>34</sup>的谈判而做出的笨拙举动，也可能是一个明摆着的警告，借此宣布中国有意向美国的航天优势挑战。该试验最起码加强了中国对台湾军事威胁的可信性，因为它显示中国在某个程度上有能力干扰美国在台湾海峡作战时所依赖的卫星。无论中国的真正意图是什么——而且许多不同的解释其实并不能相互排除——该试验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美国在未来几十年所面临的战略环境将因中国不断加强军事能力而显得更加复杂。

---

<sup>33</sup> “破坏性技术”一词是指不对称战争而言。

<sup>34</sup> 美国行政当局一直抗拒禁止天基武器的努力。在一份于2006年8月发表的航天政策文件中，美国行政当局强调拥有在“空间自由行动”的权利并表示将“制止妨碍这种权利或正在发展能力企图妨碍这种权利的其他方”。



## 从贫困到富裕

1990年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PLA）所使用的设备较不精密，也缺乏成功的战斗经验。中国当时所依靠的是地理位置和大批的地面部队，加上导弹作为核威慑。在80年代，军事现代化在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中是滞后的。由于各方面的因素——海湾战争使中国觉悟到本身的军事落后，技术方面总的进步、因经济发展而增加的财富以及担心台湾走向独立——中国于90年代中期发动了一个全面改善[军队]的项目（请看文框）。PLA大刀阔斧地从军队中削减了一百万人并开始把重点放在针对台湾的应急措施的准备工作上。军事现代化——包括从海外吸收先进技术——被纳入了中国建立“综合国力”的努力之中。

从90年代初期开始，欧盟和美国的武器禁运有效地防止了中国从西方获取先进武器，中国因此依靠从俄罗斯的进口来弥补它的军事空白。中国向俄罗斯购买了II-76重型空运工具、米-17及卡-28直升机、苏霍伊战斗机、萨姆-10防空系统、备有先进地对地反舰导弹的“现代级”驱逐舰及“基洛级”柴电潜艇。最近几年，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有了改善，使中国可以发展高质量的本土武器系统，包括拖延已久、类似美国F-16战斗机及以色列拉维战斗机的歼-10战斗机。在中国，一个能够持续推出先进和可靠系统的国防工业部门是生产各种射程的陆基导弹部门。能够与全球经济（例如造船业及信息技术）接轨的国防技术部门特别先进。全球化和先进技术的播散使限制敏感的两用技术出口到中国的机制不甚有效。<sup>35</sup>

### 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 2000至2005年，中国的官方军事开支翻了一番，达到290亿美元。如果加上对外武器采购（2005年大约是30亿美元），准军事单位的开支和给予国防工业的补贴，在根据购买力平价作了调整之后，估计国防部门的总开支是600至900亿美元之间\*。
- 中国从根本上调整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原则，从“人民战争”转向一个强调联合战斗行动和先进武器系统的原则，目的是要打一场“在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 人民解放军正在进行越来越先进和有效的培训，包括每年的多兵种两栖军事演习。
- 中国减少了人民解放军的人力，把资源转移到对（外国和本土）设备的获取，包括精密的航天、航空、海事、指挥控制及电子作战系统。
- 中国使人民解放军摆脱了过去在内部安全方面所起的核心作用，把该项任务（和大部分已经过时的设备与过剩的人员）转移给人民武警部队。
- 中国大大增加了在台湾对岸所部署的弹道导弹的数量、可靠性及准确性。现在的数量大约是800枚，每年大约再增加100枚。
- 中国正在对其核部队进行现代化，并准备部署路上移动式、使用固体燃料、带有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以代替20枚已老化的使用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使中国首次拥有一个可靠和安全的第二次打击能力。

\* Crane, et al.,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中国军队现代化：机会与限制）(Santa Monica, CA: The RAND Corporation, 2005)。

<sup>35</sup> Crane, et al.,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机会与限制）(Santa Monica, CA: The RAND Corporation, 2005); Medeiros, et al., *A New Direction for China's Defense Industry*（中国国防工业的新方向）(Santa Monica, CA: The RAND Corporation, 2005)。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局限

中国的军事战略与其军事规划和预算的过程一样，大部分仍然是不透明的。中国虽然努力地表明自己的意图，但是意图只有等到需要行动时才会完全显现，因此意图本身是不能完全看透的。中国的意图和美国一样，是有条件的。意图可能因内外因素的刺激而变得非常快。虽然中国的意图不易断定，它的能力却比较容易测量。中国的〔军事〕能力仍然有限。人民解放军海军很难把战舰遣送到马六甲海峡那么远的地方，即使可以做到也不能长期支撑这样的部署。

尽管前面提到了人民解放军多方面的进步，但它仍然面临许多障碍：

- 新设备虽然精密，却往往超出了中国现有的联合指挥控制能力。
- 同时使用过时的和先进的设备，使得有效的大规模计划、训练和行动变得很困难。
- 依靠多个外国武器供应商，因此很难建立有效的供应链和维修机制。
- 缺乏可以操纵高技术系统的，具有科技知识、创新力、肯起带头作用的人员；中国在现役军官之外没有一支相应的专业队伍，使这个问题更显得严重。
- 作战经验有限—中国的军队在 1979 年之后就没有参加过主要的战斗，而当时他们与越南军队作战时的表现并不好。
- 缺少兵力投射所需要的诸多手段，包括远程轰炸机、航空母舰、大型的空降部队及可以在境外支持和维持作战部队的后勤能力。

这些障碍都不能在短时间内克服，而且任何一个问题都不是投入更多的资金就能解决。

## 人民解放军的对手也在进行现代化

在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同时，它的一些邻国和潜在对手—日本、韩国与俄罗斯—也并没有高枕无忧。尽管日本的国防开支仅占了其 GDP 的百分之一，日本在过去的 15 年中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军事能力。日本的海军配备了宙斯盾雷达系统和配套的导弹系统；日本的空军也配备了装有先进空对空导弹的战斗机。日本正在与美国合作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主要是针对北朝鲜的威胁，但是在与中国起冲突时也明显可以应用。日本从 2002 年开始就在印度洋保持了海军存在，支持在阿富汗的“持久自由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在远离本国基地的行动中得到了宝贵的经验。韩国也在进行重大的现代化努力，利用许多向美国采购或是与美国的国防工业联合开发的先进系统，以代替过时的战斗机、护卫舰、坦克车及战炮。韩国部队与美国部队间有很好的协同作战能力，这点从韩国派遣 3 千多人的部队到伊拉克再次得到证明。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先进军事硬件供应国，但同时也是中国一个潜在的大国对手。俄罗斯的总体军事能力在 90 年代严重下跌，但是在石油方面的大量收入莫斯科似乎有意开始进行一场大型的军队现代化运动。俄罗斯官方的国防预算从 2001 年的 81 亿美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310 亿美元，几乎是翻了两番。俄罗斯的国防部长于 2007 年 2 月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预算达到 1900 亿美元的现代化计划。该计划要求替换现有的大约 45% 的军事设备，包括部署几十枚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31 艘新的军舰（包括 8 艘弹道导弹潜艇），还可能再加上一艘新的航空母舰。虽然俄罗斯可能无法完全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莫斯科军事能力的加强将使中国的国防计划和兵力投入更加复杂化，因为中国必须小心翼翼地看好与俄罗斯长达 4300 公里的边界。

鉴于中国在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中，对台湾问题给予相当高度的重视，所以在估量中国渐渐扩大的军事能力时，台湾本身的军队现代化就是一个最相关的因素。在 90 年代，台湾从美国和法国购进了 150 架 F-16 战隼和 60 架幻影先进战斗机、护卫舰、地对空导弹及作战飞机系统，目的是要通过质量的优势胜过中国部队数量的优势。但是最近，台湾的国防开支其实在**缩减**。台湾政府无法拨款购买布什总统于 2001 年授权售卖给台湾的、价格达 180 亿美元的武器。该军售包括潜艇、反潜巡逻机及导弹防御系统。台湾正在寻求购买价格达 30 亿美元的 60 架新的 F-16 战斗机以替代老化而退役的 F-5 战斗机。但是这笔款项还未批下来，而美国也敦促台湾在提出新的采购单之前，至少先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主要武器采购问题。

美国本身也正在为在太平洋战区（特别是关岛）的前方部署的海军和空军进行升级，同时也将首次将一台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基地设在日本。此外，美国正在与其主要的亚洲盟友改善协同作战能力，与它们进行更实际、更复杂的多边演习。美国与印度、蒙古及印度尼西亚也正在扩大军事合作。美国的海空军比中国超前一至三代，同时美国的国防预算大约是中国的 8 倍。美国的部队在近期有相当多的大规模作战经验，同时在联合作战方面驾轻就熟。美国将继续控制该地区的海上航线，中国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石油与其他货品大部分都需要经过这些航线。最后，美国在中亚的部队存在使中国的国防计划复杂化，而中国与俄罗斯和印度相当长的边界更是复杂化的因素，因为俄罗斯和印度都保持有庞大和现代化的军队。

*本工作组认为，中国的许多邻国和潜在对手正在严密地注意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并对本身的国防计划和开支做出调整以平衡中国不断扩大的军事能力。但是台湾在面对中国的国防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跟上，把更多的遏制中国潜在的军事行动的负担移交给了美国。*

## 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底线

对军事平衡的评估不应停留双方的数字比较上。这种估算需要包括对一个国家的潜在军事任务做出评估。中国主要的军事任务包括遏制核攻击、纵深保卫领土、劝阻台湾不走向独立、有必要的话还要攻击台湾或甚至以武力夺取台湾。中国在未来可

扩大人民解放军的任务，使它更广泛的利益受到保护。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这方面还是很保守，仅参加了远至非洲的多边维和行动。美国目前与未来在东亚的军事任务是保护其盟友不受到侵略，击败恐怖活动，防止核扩散以及在更广的意义上提供一个稳定的安全环境，使本地区各国可以享有和平与繁荣。

目前美国与中国的任务当中具有潜在冲突的主要领域是台湾。中国可以用导弹破坏台湾，但它若要拿下和占领台湾就必须要在台湾周围的太空、天空及海域赢得并保持控制权——在没有美国的干预之下这已经是相当艰难的任务；若美国干预中台战争，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本工作组认为，由于军事现代化，中国在能与台湾作战并打赢战争（在没有美国干预的情况下）方面取得了进展，同时中国也开始发展军事能力，保障自己不断扩大的全球利益。单是这些能力的存在——包括反卫星系统——就给美国带来挑战。中国根本不需要超越美国，甚至不需要赶上美国，就可使美国的国防计划复杂化，或是在台湾海峡或其它地方出现危机时影响美国的决策。然而若我们前瞻2030年，本工作组认为，中国将成为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军事竞争对手这样的观点缺乏证据。纵观美国的历史与经验、设备与技术的水平、人员及花费的资源，美国在太空、天空及海上都超越中国。今天和可预见的未来的军事平衡仍对美国和其盟友非常有利。*

# 美中关系

前面我们分析了中国在经济和社会转型、对外政策及军事现代化方面的最新趋势。经分析呈现出来的这个复杂图景突出了美国政治领域中有关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在美国政府间，甚至在同一行政当局内，对中国有不同的评估，甚至有时候还出现相当尖锐的分歧。对中国很难下定义。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也经常把美国对华利益的优先顺序做不同的安排，结果有一些官员注意到了进展，而其他的人却没看到。布什政府在 2002 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美国与中国在台湾与人权的问题上有“深刻”的分歧，指责中国不拥护民主和宗教自由，并对中国的国防现代化表现出特别暗淡的看法。报告警告说，“中国追求先进的军事力量，此举会对其在亚太地区的邻国造成威胁。中国所走的是一条过时的道路，最终将阻碍它成为伟大民族的目标。中国最终会发现社会与政治自由才是其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唯一源头。<sup>36</sup>”但是两年后，在 2004 年，当时的国务卿鲍威尔宣布美中关系处于自 1972 年尼克松与毛泽东恢复关系之后的最佳状态<sup>37</sup>。三年之后，即 2007 年 2 月，副总统切尼明确地重申了布什政府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深切关注，指出中国的“快速的军事集结”与“中国已表明‘和平崛起’的目标不一致<sup>38</sup>”。

对中国如此不同的公开看法反映了本届政府内部意见的分歧以及中国本身的多样性。然而，这种不一致的观点有损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有效性。本工作组认为，美国必须致力于一个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的一贯政策，目标是在利益一致（或有可能一致）的领域继续求发展并缩小有分歧的领域。长期来说，美国的政策必须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给予考虑。甚至在短期内，美国也必须在中国的行为与美国的关键利益相冲突时，作好准备，使用所有的国力—坚持对人权的理念、法治与议会制政体、外交力量与影响力、经济力量与活力以及军事能力—向中国提出挑战。

在这个背景下，本工作组接下来将更详细地讨论美中关系中的具体内容。

## 经济关系

当时的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在其“利益相关者”的演讲中明确地指出，中国在制止美国的知识产权被盗方面的失败和中国货币的估值偏低，这两件事使美中关系受到了威胁，也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部分原因。事实的确是这样，对这些和其它贸易不公平手段的关注很容易使美中关系受到破坏，美国国会对这些问题的反应尤其强烈。美国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但美国支持全球化的前提是所有的国家都要遵守游戏规则。认为中国不守规则或中国利用体系中的含糊之处使美国处于不

---

<sup>36</sup>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September, 2002, p.27.

<sup>37</sup> “Powell: China Ties Best in 30 Years (鲍威尔：对华关系 30 年来处于最佳状态),” *The China Daily News*, November 11, 2004.

<sup>38</sup> 副总统于 2007 年 2 月 23 日向澳裔美国人领导能力对话发表演讲，可在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2007/02/20070223.html> 获取原文。

利地位的这种印象，往小处说，将削弱支持发展美中合作关系的基础，从大处讲，将削弱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基础。

### *知识产权方面的关注*

根据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估计，知识产权（IPR）受到侵犯使美国公司每年在全球的损失达到 2000 至 2500 亿美元之间，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中国的盗版所造成。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估计中国单是在数字媒体（录音录像光盘）方面的盗版就造成美国公司每年损失大约 23 亿美元。本工作组认为，这些数字估计高过了实际的损失，因为这是假设如果这些盗版的产品不存在的话，廉价盗版产品的消费者就会购买同样数量的美国产品。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的需求是具有伸缩性的，因为许多中国的消费者没有足够的收入来购买这些价格更高的真货。但是，随便走在中国任何一条购物街上，冒牌货比比皆是，甚至在著名的百货公司内也是如此，这却是事实。可是要找到北京奥运福娃的盗版本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美国要求中国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所作出的努力可以追溯到 90 年代初期。当时中美进行了一系列的双边谈判并达成协议，要求中国制定法律保护从专利到版权的各类知识产权。中国于 2007 年 3 月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版权条约及音像制品条约。这两个条约也涵盖了 WIPO 的互联网条约。中国[在这方面的]法律日益增多，但是有两个问题依旧存在：执法和惩罚力度不够。一些引起高度注意的法律行动虽然保护了像辉瑞（Pfizer），通用汽车（GM）、星巴克（Starbucks）及柯达（Kodak）这样的商标，但执法案件还是很零星，而且美国也不占太大的优势。WTO 缺少已确立的衡量标准来确定什么是有效的执法，同时 WTO 也不要求任何国家把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执法视为比其他方面的执法更优先。如果一个案子投诉中国的法律法规没有达到 WTO 的标准，那它败诉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中国的法律法规实际上是符合 WTO 的要求。而且，美国的公司因为害怕丢掉生意也一直不愿意向政府提供详细的信息，使案子可以告到 WTO 那里。第二个问题是在惩罚方面。中国的知识产权法所提供的惩罚是非常轻微的，所以即使执行了，其威慑的效果还是很小。

长期来看，中国认识到执法不严也会威胁到中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因此也会更愿意保护知识产权。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出现。根据中国国家工商管理总局（SAIC），中国公司近年来大量进行商标注册和专利申请。随着这种趋势的增加，对被指控的侵权行为所进行的调查和提出的诉讼也会增加，而原告大部分是中国一方。

*本工作组认为，中国在符合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方面失败了，原因是缺乏决心，也缺乏能力。猖獗盗用知识产权正在削弱美国商界和国会对发展更密切的美中经济关系的支持。至今为止，中国在处理美国所关注的知识产权问题上所作的努力一直严重不足。*

## 货币价值

中国的货币估值偏低是美中之间另一个主要的摩擦。中国的货币确实是估值偏低，造成了一些美中的贸易逆差。但是一个快速、大幅度升值的人民币是否对美国有利也引起相当大的疑问。下面我们将讨论到，人民币的价值不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主因，而且美国不应该期望人民币升值能解决美中的贸易问题。

中国目前经常帐户的顺差从 2002 年占 GDP 的 2% 涨到 2005 年占 GDP 的 6%，而且还在急剧攀升。在过去三年的每一年里，中国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很大的，平均大约是每年 2000 亿美元。这些干预的结果让中国于 2006 年初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总共累集超过 1 万亿美元的储备。

有了这些事实，中国为什么仍然把其货币的价值刻意压低呢？在中国，货币政策当然是与国内的政策辩论有关。中国的领导人担心任何使人民币升值的大动作都会在三方面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损害：（1）吸收食品进口进而造成农产品收入减低；

（2）使出口和与出口有关的就业机会下跌；（3）使支持中国近年来国有企业（钢铁、水泥、化学物品）过度投资所发放的贷款受到威胁，[因为]大部分的投资是对它们的放贷。人民币升值会使许多这类信贷受到威胁，因为很多贷款不是以信用为基础，而是以政治压力为基础发放的；而这种结果反过来又会使原本就脆弱的国家银行体系承受更大的压力。

即使面对这些问题，北京在调整人民币的汇率方面毕竟还是动作缓慢。2005 年夏季，中国制定了更为灵活的汇率框架，开始把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调整了 2.1%，后来调整的幅度也限制在每日 0.03%。总体上说，从 2005 年实施更灵活的汇率之后，人民币兑美元上涨了 6.5%。

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感到懊恼的美国国会议员于 2005 年提出了一个强迫中国让人民币升值的法案。在参议院得到两党广泛支持的舒默-格莱姆法案，要求中国按照市场的价格调整货币，否则就要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物品全面实施 27% 的关税。两位参议员在布什政府的压力下，于 2006 年秋天访问中国之后撤回了这个法案。但他们承诺在新的国会中再次提出类似的措施。与此同时，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鲍克斯（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员）和该委员会的第二号成员格拉斯利（爱阿华州共和党员）表示有意提出他们自己所起草的与 WTO 规则一致的法案以处理人民币价值的问题。

如果中国真的让其货币对美元大幅度升值——达到 25% 以上的话，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他亚洲国家货币的活动，因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物品的价值中大约有 65% 是来自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物品的价值，包括零部件及原材料的进口。如果其他亚洲国家不允许货币升值的话，中国从亚洲邻国进口的产品的人民币成本就会下跌，而中国在出口价格方面的增加就会很有限。价格的移动有可能在某个程度上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大约在 200 至 400 亿美元之间，但是专家对此意

见不同。在过去的 18 个月里，虽然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值提升了 6.5%，中国到美国的出口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是增加了，而不是缩减了。

如果其他亚洲国家让它们的货币跟着人民币一起大幅度升值的话，对美国的全球经常账户赤字就会有更大的影响。这样不只是中国的人民币进口价格会上涨—使中国在全球市场的货品价格上涨—其它出口到美国的亚洲产品的价格也会上涨。亚洲货币这种连锁反应的上涨会对美国的经常帐户赤字造成相当大的影响，比起上面估计的 200 至 400 亿美元还要多几倍。

但是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也会给美国和中国带来反面的副作用。美元兑人民币如果疲弱，就有可能在中国抛售贬值的美国国债时使美国的利率上升—破坏美国的房地产业—同时也可能一下子造成中国银行业的不稳定。中国的经济可能因此放慢脚步，相应的影响其东亚的贸易伙伴，特别是日本的经济，也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另一方面，人民币如果升值，中国公司可能会在美国大量进行采购，进而加大，而不是放松经济方面的紧张。有一位评论家说，“如果您认为今天在华盛顿大家三句不离中国，等到这个全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公司开始投标收购通用汽车、微软、波音或埃克森-美孚时更有得您瞧的。”<sup>39</sup>

人民币的价值与美中贸易逆差的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消费与储蓄的习惯的不同。简单地说，美国消费过剩、储蓄太少，而中国正好相反。从 2000 年开始，中国作为 GDP 一部分的家庭用品消费一直下跌，到了 2005 年只达到 GDP 的 38%，比起 1990 年代的平均 46% 还要少。<sup>40</sup> 中国人储蓄主要是因为他们现在比从前在更多的生活方面需负起责任；他们现在需要自己负责住房、医疗和退休金。中国在 2004 年宣布制定计划，从以投资与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向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发展道路，<sup>41</sup> 但至今效果仍然不佳，而中国的外贸顺差仍然不停地增加。中国走向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努力可以由政府在医疗、教育、福利及养老金方面的非投资性支出得到加强。这类支出不仅可以提高消费需求，还可以让更多的私人资源投入消费。

本工作组认为，通过增加关税威胁中国，向它施加压力使其货币升值的动机是好的，但做法是错误的，而且很可能引起反效果。有关货币价值的变动必须是所有大幅度削减美中贸易赤字一揽子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把这么多的国会精力和政治威信放在这个问题上是对资源的错误应用，因为这些资源可以更好地被使用在其它方面。导致贸易不平衡有许多因素，其中包括美国与中国正在改变的消费方式，

---

<sup>39</sup> William Pesek, “For U.S., China Isn’t the Problem (对美国来说，中国不是问题),”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14, 2006.

<sup>40</sup> Nicholas R. Lardy, “China: Toward a Consumption-Driven Growth Path (中国：走向以消费为导向的增长道路),”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 October 2006, 可在 <http://www.petersoninstitute.org/publications> 获取。中国的消费率是世界上任何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在美国，2005 年的消费是 GDP 的百分之 70，在印度是百分之 61。

<sup>41</sup> “Central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Convened in Beijing December 3 to 5, (中央经济工作大会 12 月 3 至 5 日于北京召开),” *People’s Daily*, December 6, 2004.



还有对美国的零售商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亚洲产品供应链的终点站。如果美国与中国能够纠正本身的宏观经济政策，美中的贸易逆差就会缩减。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强调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增长并在社会服务方面（如医疗和社会保障）增加支出。中国还有必要加强它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美国帮助中国改善中国资本市场的法规和监督该市场的健全完全符合美国本身的利益，因为一个有活力的国内资本市场将有助于中国减少过度依赖大量流入中国却无法有效吸收的资本。

## 利益与公平

越来越多美国人相信美中贸易有损美国经济，也相信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手段造成了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这两种想法都是错误的。但这并不表示与中国竞争就一定是良性的或公平的。美国经济中的一些部门的确是受到与中国竞争的损害，而且根据美国贸易代表看法，中国的一些经济政策造成了对出口的不公平补贴，违反了中国的 WTO 义务。<sup>42</sup>

根据最近一份研究报告，由于美国自 2001 年以来一直在增加与中国的贸易和在中国的投资，结果美国的物价会在 2010 年将下跌 0.8%，而 GDP 将上涨 0.7%。这表示每年每个平均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将增加一千美元。<sup>43</sup> 根据国际经济研究所 (IIE) 和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一项联合研究结论，与中国进行贸易为美国的总体经济增加了大约 700 亿美元，同时“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应该是对产出，生产率、就业及实际工资的一种持续不断地、良性的推动”。最近由美国国会研究服务机构所完成的有关美中经济关系的全面研究也得出结论，“中国经济的崛起本身并不会破坏或降低美国的生活水平——这将主要取决于美国的经济政策...。总体来看，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对外开放政策对美国和中国经济都是积极的。”<sup>44</sup>

由于美国的储蓄量不足以融资总体的支出与投资，美国必须向外贷款，以致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与美国有经常账户顺差。中国不但不拒绝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它实际上还是美国成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同时中国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中是最开放的一个。在 2000 至 2005 年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大约增加了 160%，而对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出口只增加了 10%。在这 5 年期间，中国占了美国公司出口增长的一半。双向贸易从 1978 年的 9.9 亿美元增加到了 2005 年的 2850 亿美元。中国现在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美国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进口关税低，所使用的配额也仅限于几种农产品的进口配额，同时中国也取消了

---

<sup>42</sup> 请参看 <http://usinfo.state.gov/xarchives/display.html?P=washfile-english&y=2007&m-March&x=20070312144030&zjsredna0.2189752>。

<sup>43</sup> Oxford Economics and the Signal Group, “The China Effect: Assessing the Impact on the U.S. Economy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 China (中国效应：评估对华贸易与投资对美国的影响),” The China Business Forum, January 2006, p. 17。

<sup>44</sup> Craig K. Elwell, Marc Labonte and Wayne M. Morrison, “Is China a Threat to the U.S. Economy? (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是个威胁吗?)”,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anuary 23, 2007, 可在 <http://www.fas.org/sgp/crs/row.RL33604.pdf> 获取。

对进口的许可证要求，几乎是准时地履行了 WTO 的义务。中国的进口与 GDP 的比例是印度（其关税几乎是中国的三倍）的一倍半，美国的两倍及日本的三倍。

此外，今天美国向中国购买的大多数产品过去是向其他东亚国家购买的。整个东亚在美国总体贸易逆差中所占的份额从 1985 年的稍微超过一半（当时中国占此逆差为零）降低到 2004 年的 40%（当时中国占此逆差的 25%）。东亚各地，特别是香港、日本、新加坡、韩国与台湾的生产者把它们生产能力的很大一部分转移到中国。美中贸易逆差的增加与外国（大部分是亚洲）在中国生产设施投资的增加是平行的。<sup>45</sup>

中国对外国投资有非常开放的环境。自从 1978 年的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吸引了 6000 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投入在制造业。这些外国直接投资有超过四分之三是来自亚洲各国。在中国的外国公司现在生产了几乎是中国 30% 的制成品，稍微超过了在欧盟的外国公司在制成品生产方面的份额，同时是美国的一倍半，大约是日本的 25 倍。

*本工作组认为，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总的来说对美国人民有利，对中国人民也有利。与中国的庞大贸易逆差是全球贸易趋势的一种现象：中国在这方面并不特殊，同时这种逆差也并非完全是中国对市场准入的限制、低工资或其它歧视性贸易手段所造成的。但是中国还未把它所有的经济政策都调整到与它的 WTO 义务相一致，这就使得美国的协同行动显得非常可取，因为该行动是为了保护美国工人免受不公平竞争，同时也有助于维护整个全球贸易体系的合法性。*

所以紧接着我们要讨论中美经济竞争中我们所关注的最后一个重大问题：就业。

### *美国的就业问题*

许多美国人本身对工作缺乏安全感，认为是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关，这是可以理解的。美国制造业工作的流失引起了特别的关注，但是对外承包的问题之所以在政治上这么有吸引力是因为白领工作（法律服务、会计及医疗服务）也正在往海外迁移。

---

<sup>45</sup> 这种相关的现象很突出。在 1980 年流入中国的 FDI 大约是每年 5 亿美元，其中外国公司从中国的出口占总出口的不到 1%，而美国当时与中国的贸易有很大的顺差。到了 1990 年中期，每年流入中国的投资增加到大约 450 亿美元，其中外国公司从中国的出口占总出口的三分之一，而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一跃达 300 亿美元。在 2005 年，中国大约吸引了 600 亿美元的 FDI。同一年，美国自中国进口的产品中有大约 65% 是外国公司制造的（大部分是亚洲公司），而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一下高达 2000 亿美元。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制造业在就业市场的份额就一直下跌。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需求量的增长，因为消费者更多地把消费放在服务上而不是货品上。<sup>46</sup>在 2000 至 2003 年之间，制造业经历了在就业方面的急剧下跌，总共失去了 285 万就业岗位。这些工作的丧失与美中贸易逆差的稳定增加刚好相符合，使得一些观察家把两者挂起钩来。其实，在这段期间，进口制成品的增长是非常缓慢的（大约 2%），同时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的研究显示，在失去的 285 万就业岗位中，只有 31.4 万个是因为全球贸易所造成的。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使用同样的原始数据但不同的方式进行的研究也显示，对外贸易的影响所造成的就业岗位流失大约是 60 万个。其他工作的流失是因为生产力提升了，经济周期性的衰退及出口的猛跌。即使是使用[以上两个数字中]比较高的估计数字——60 万个——中国的影响还是轻微的，因为中国在 2000 至 2003 年之间只占美国贸易逆差的 25%。

对外承包——特别是把生产搬到中国然后再把产品出口到美国市场——经常被认为是美国就业机会下跌的原因。但是根据美国的联邦政府审计总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的一份报告，从 2002 年开始，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出售给中国顾客商品的增长比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还要快——甚至还超过它。这表示大部分的美国公司利用它们在中国的投资打入了中国市场，而不是把在中国生产的物品卖到美国。<sup>47</sup>

这些研究碰上了一个难以克服的政治现实：失业造成的痛苦是尖锐和局面的；而整体经济所获得的利益却经常是分散的，这些利益极少被认为是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有关。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制造业的工作流失是集中在 7 个大湖区州：伊利诺州、印第安纳州、密西根州、纽约州、俄亥俄州、宾西法尼亚州及威斯康辛州。尽管这些流失的工作岗位和外贸所创造的服务业的新就业机会能相互抵消，但这些新的就业岗位有很大部分不一定能让制造业工人争取到。同时，服务业部门的工作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与制造业工作的工资和福利都不一样。

*本工作组认为，美中经济关系的成长是在美国的就业结构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的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中国绝对不是导致这种转移的唯一因素，也不是美国就业机会流失的主要源头。因此，美国若要对这种转移做出有成效的反应，它不仅需要鼓励中国遵守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更重要的是要确保美国的劳动人口尽可能受到教育与培训，另外还要制定政策——失业保险、流动性医疗保险、再培训计划等等，以确保工人在突然失去工作时[有保障]。*

---

<sup>46</sup> 有关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的详细分析请参看 David Brauer, “What Accounts for the Decline i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是什么造成制造业就业的下跌?)”, U.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February 18, 2004.

<sup>47</sup> “China Trade: U.S. Exports, Investment, Affiliate Sales Rising but Export Share Falling (与中国的贸易：美国的出口、投资及附属销售上升但是出口份额下降),” GAO-06-162, December 2005, p. 35.

## 美中安全关系

美中经济关系生气勃勃、不断增长，但是美中两国的军事关系相对来说发展缓慢，即便碰到像北朝鲜的核野心这种棘手的问题需要我们紧密协调的情况。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陆战队上将彼得佩斯于 2007 年 3 月访问中国时，呼吁两国在安全方面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以“避免误解并使亚洲更加稳定和繁荣”。<sup>48</sup>

布什总统上任后不久，因为进行对华政策的审议而让两国的军事关系暂时搁置。2001 年春天此关系达到低潮，当时一架中国海军航空兵的 F-8 战斗机拦截了一架正在海南岛海岸外国际领空内执行任务的美国 EP-3 电子侦察机。中方的战斗机跟踪美方的 EP-3，最后与以慢速度前进的侦察机相撞，导致了中方飞行员的死亡，同时迫使 EP-3 的飞行人员不得不在海南岛的中方军事飞行基地紧急降落。美国的机组人员被拘留十一天之后才获释回国。事件的严重性使两军关系无限期的中断。EP-3 事件已成为美中军事关系的一个隐喻，正如天安门事件成为中国政府抗拒政治改革的象征一样。

经历了这次颠簸之后，双边的军事交往在最近几年，特别是在 9/11 之后，已开始出现好转，现在包括了高层对话项目、工作层会谈、舰船互访及功能性交流等项目。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于 2005 年在任期内首次访华，同时在访问过程中，成为目前所知道的首位参观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部队）的外国人。2006 年，美国与中国的海军进行了两项演习：在夏威夷附近的交汇演习（PASSEX）及搜救演习（SAREX）。这些项目代表了相当大的突破，也包括了自 2000 年来中国海军军舰首次访问一个美国海港。

但是两国军事关系还是不温不火，同时受到相互不信任的束缚。双边军事关系中最核心的两个问题，台湾和战略核部队，一直让华盛顿和北京感到为难。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于 2006 年 4 月在建立几个信任措施上取得共识，包括就中国的战略部队现代化和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进行对话，但至今成效不大。

要改善沟通就需要在双边的军事交往中面对互惠和透明度问题。美国国防部努力促进双边军事关系更透明，但是北京对此有所抵触，其理由是，“透明是强者对弱者使用的一个工具”。最近每年发表两次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是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步，但是其内容笼统，用处不大。更大的透明度将使一方更好地了解对方的军事原则和能力。

*本工作组认为，一个有持续性、有系统的有关军事问题的官方对话将加强信任和减少误解和失算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候更是如此。为了说服中国在国防计划上更加开放，美国本身也需要更开放。但即使美国这么做，中国仍不可能完全礼尚往来。但这不应该使美国放弃与人民解放军保持接触，因为越频繁的交流将使*

---

<sup>48</sup> Jim Garamone, “Pace Visits Paves Way for Better Relations with China (佩斯访华为改善美中关系铺路),” 可在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newsarticle.aspx?id=32579> 获取。

人民解放军有机会接触外界的看法，同时可以确保中国能更准确地了解，军事平衡在今天与可预见的未来对美国有利到什么地步。

## 北朝鲜与六方会谈

目前与北朝鲜斡旋的努力是东北亚国家最重大的安全合作活动。会谈若取得成功，能为东北亚奠定一个新的多边安全机制的基础，也能在未来为其他领域中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及北朝鲜的进一步安全合作奠定基础。虽然最近会谈取得了进展，但如果它最终失败了，而美国和中国对下一步应该如何面对北朝鲜的核项目又有分歧的话，美中的安全关系将变得更加紧张。

中美对北朝鲜带来的挑战看法不同。两国在促进北朝鲜的经济改革这点上有共同的利益。北京多年来一直鼓励北朝鲜在经济上开放，并负责训练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学家，向北朝鲜展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就，并鼓励北朝鲜走出孤立。中国的领导人不愿意支持一个在经济上破产的北朝鲜。他们与金正日合不来，而过去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朝鲜人民军联结在一起的同志情谊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中国和美国对北朝鲜带来的威胁看法毕竟还是不同。中国领导人十分担心一个崩溃的北朝鲜会在中国的东北造成大规模的不稳定，导致这个原来就有爆发性的地区更加紧张。对中国来说，这是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问题。中国认为来自北朝鲜的核威胁是间接的：中国真的不太相信北朝鲜有朝一日会使用或出口一个核装置，因为那样做所带来的破坏将会危及北朝鲜自己。但是鉴于北朝鲜核项目的副作用，中国确实是认真对待该项目所带来的不稳定，同时中国寻求北朝鲜完全废弃该项目。具体地说，中国最担心的还是美国以军事行动对付北朝鲜（造成难民流和混乱），担心美国可能会带头向北朝鲜实施国际制裁，导致北朝鲜陷于瘫痪或其政权被推翻（迫使中国必须“选择支持一方”），或者日本可能选择发展核武器（破坏了中国全球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同时也可能让韩国和台湾受到鼓励而重新考虑各种核选择）。

北京需要在这种种的考虑中取得平衡，因此迟迟不愿意向北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但是它仍然愿意向北朝鲜施加一些有分量的影响力。中国为北朝鲜提供了大约90%的燃油。这不仅是北朝鲜电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北朝鲜军队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虽然北朝鲜利用当地的煤炭生产超过80%的电力，但是燃油的供应如果被切断的话，北朝鲜的经济将受到扼杀，朝鲜人民军也将会受到束缚。

中国也反对把北朝鲜逼入墙角，因为金正日在危机出现时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让中国感到担心。中国也怀疑任何代替金正日的政府会比金氏王朝更好。最后，中国不太愿意使用它全部影响力的一个原因是一直对美国的战略意图持怀疑态度。美国到底是寻求一个无核化的朝鲜半岛，还是寻求北朝鲜的政权改变？还是两者皆是？美国是否寻求一个可以让美国部队驻扎的统一的、有核的朝鲜？

美国的看法与中国不同。美国认为北朝鲜拥有核武器是对美国和其盟友韩国和日本的直接威胁。而且，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承诺努力实现全球核不扩散。美国——特别是在 9/11 之后——对北朝鲜有可能出口核原料深感关注。美国不信任北朝鲜可以看守好这些核原料。

北朝鲜在最近几个月的行动——于 2006 年 7 月接二连三地发射导弹、于 2006 年 10 月爆破了一个核装置、最后于 2007 年 2 月 13 日在原则上重申它同意放弃核项目以换取经济和政治上的一揽子优惠——为美国和中国缩小分歧并使战略目标和政策更接近提供了一个机会。中国支持联合国对北朝鲜进行制裁说明了中国除了给予平壤传统上的保证之外，现在也愿意考虑对北朝鲜施以强制性的措施。而美国愿意在六方会谈之外，再与北朝鲜进行直接的双边对话也说明了美国的政策有了新的灵活性，同时不再把政权改变作为一个现实的选择。美国如果启动一个可以探讨两国在朝鲜半岛的长期利益与目标的对话，就有可能从北京那里赢得更多的合作。

*本工作组认为，尽管美国和中国对北朝鲜带来的威胁看法不一致，但两国仍然有机会扩大政策协调的领域，同时还可以与日本，特别是韩国一道开始形成一个有关朝鲜半岛未来的共同预见目标。奖励和遏制作用如果可以更平衡的调和——“亚洲大棒”加“美国胡萝卜”与“亚洲胡萝卜”加“美国大棒”并用——可以产生积极的结果并加大北朝鲜履行其在 2005 年 9 月 19 日和 2007 年 2 月 13 日所作出的无核化承诺的机会。*

### *出口管制及技术转移的制裁*

中国的经济与军事现代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赖从外面吸收技术。诚如前面所提，中国也在建立自己的技术基础，使得这种依赖的程度渐渐缩小。在天安门悲剧发生之前，美国总是积极地鼓励中国吸收许多先进的技术、甚至包括直接与军事应用有关的技术，而且还为之提供方便，目的是要制衡苏联。虽然出口到中国的技术受到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COCOM）所制定的机制的控制，中国一般比苏联得到更好的待遇。在 1989 年之前，中国通过外国军售获取了美国的军事硬件，并非常活跃地寻求先进的两用技术，如机械工具、计算机及航天系统等。

美国对技术转移到中国的态度是在天安门事件和苏联解体之后才突然改变。技术转移成为美国面对中国的一个有利条件，新的法律试图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来改进中国对外和对内的政策。美国国会和乔治 HW 布什政府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禁止对华销售军事硬件，并要求中国的人权政策必须得到改善，才能恢复军售。国会限制了与中国的核合作，非常严格地要求这种合作必须与美国防核扩散目标方面的合作挂钩。国会也在航天合作上——包括利用中国的火箭发射美国的卫星——实施同样的制裁，作为对中国扩散导弹技术的回应。<sup>49</sup>

---

<sup>49</sup> 这与里根时代的美国立场有鲜明的对比，当时虽然中国积极地对伊朗军售，美国仍选择在航天飞机挑战者号的悲剧发生后让中国的火箭发射美国的卫星。

目前美国的商务部正在考虑限制 47 个新类别的两用技术。商业团体认为新的法规很模糊，并指出几乎大部分在名单上提出的技术在欧盟、日本或是中国本身都已经有了它们的生产者。这意味着任何出口管制要有成效就必须是多边的，但这一点不容易做到。美国于 2005 年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欧盟继续对中国禁售武器（从天安门事件之后就有这种限制）。这个跨大西洋的对话成功地让许多欧盟决策者对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利益及对人民解放军现代化的快速脚步与范围更加关注。大概除了法国之外，目前在欧盟内没有提倡要结束武器禁运的强大势力。但是，欧盟的成员国总还是希望扩大而不是限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因为它们都希望能够在中国不断扩大的技术市场中获得更大的份额。美国与日本的磋商说明了在东京也出现同样的趋势，日本首相安倍希望最近解冻的中日关系能够持续更是证明了这种趋势。欧盟和美国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鼓励了中国与俄罗斯发展热络的武器供需关系，包括采购、共同生产，培训和共同军事演习。

商务部最近也提出，然后又撤回了对“视同出口产品”的新限制。这些新的法规将使美国的公司和大学更不容易雇佣中国公民（及其他外国学生）在美国的实验室工作。商业团体和大学在发出了大量的反对声音。他们说，如果美国担心竞争能力受影响，担心它培训和吸引最杰出的人才的能力受影响，那它就不应该把这些学生视为二等公民。结果这个建议被撤回了。但是新的建议还在考虑之中。

中国曾经抱怨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的限制在很大的程度上造成了美中的贸易逆差。*本工作组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说服力，从经验上来看也是错误的。*美国限制一些敏感的技术出口到中国是有合理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原因的，比如有些技术即使不被中国使用来损害美国的利益，却有可能落在那些有意要伤害美国的人手中。在 2005 年，出口许可的要求只减少了美国对中国出口总值的 1.5%。根据商务部的数据，在美国价值 390 亿美元的出口中，只有大约 30 亿美元的出口值得向商务部申请出口许可，而且几乎所有的这些出口最后都得到批准。

今天，美国将继续使用对技术转移的出口管制和制裁对敏感货品的转让给予保护，在中国的行动违反美国的利益时（如扩散）给予惩罚，或借此制定奖励措施让中国改变它的对外和对内政策。布什政府也对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规、经常把两用技术售卖给伊朗、利比亚或北朝鲜的十几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

*本工作组认为，有选择性地对技术外流实施制裁有时候能影响中国的外交行为——特别是当制裁加上高度公开的外交手段一起使用的效果更好。中国向伊朗出口桑蚕巡航导弹就是一例。但制裁不太可能促使中国改善它的对内政策。只有在其它供应商的数目原本就不多，制裁限制了它获取高价值技术的渠道时，这种制裁才最有可能改变中国的行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会重新估算自身的利益。*

# 工作组建议

## 确定航向

要加强美中在面对区域与全球挑战时的共同合作，美国首先不仅要向北京清楚地说明美国的政策目标和优先事项，也要向美国人民清楚说明。美国历届政府已经发现，要在美国人民和他们所选出的代表那里取得超党派的共识，使他们支持与中国建立一个紧密与合作性的关系，一个强有力的总统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对华政策是总统制定的，但也受到国会与美国负责实施政策的许多部门和机构所牵制。第110届的美国国会有了新的领导，布什政府也在处理余下任期内的的工作，因此现在时机难得，可以来讨论如何以最好的方法加强美中在区域与全球具有挑战性和紧迫性的问题上合作，然后如何达到政策共识，使美国带着这种共识走过下届总统选举，迎来2009年新一届的政府。

布什总统2006年4月在接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时就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做出了清楚的说明。布什总统说，“美中两国虽然远隔重洋，但一个为两国人民创造机会的全球经济把我们连接起来了。美国欢迎一个和平与繁荣、一个支持国际体系的中国的崛起。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利益相关者，我们两国有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胡主席和我将讨论如何促进这些利益，以及中美两国如何能负责地与其他国家一同处理共同面对的挑战。”

布什总统在同一次讲话中也提到他会非常坦率地向胡主席提出两国之间的分歧：美国将不会忽略在中国对外和对内政策中美国所关注的问题。

正如前面已经提过的，本工作组对美中关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目标表示附议。本工作组相信将中国纳入全球社会是鼓励中国行事符合美国利益与国际准则的最佳战略。要持续获得支持，与中国建立一个紧密、坦诚及具有合作性的关系的最好办法就是能清楚地阐明一个积极的信息，即呼吁大家意识到在诸如不扩散和保护全球环境的问题上实现与中国合作的潜在利益。美国需要不时地向中国表明，任何不负责任或有敌意的行为会遭到强烈的反对，也会伤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美国更需要经常性地鼓励中国成为全球体系中更负责任的一员，并通过对话和相互尊重对地区和全球挑战制定一致性的反应。

因此，我们首先建议总统加强最近让美中关系步入积极轨道的工作，包括：

- 明确和更经常性地表明美国要与中国建立一个紧密、坦诚和具有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 向美国民众解释一个强有力的双边关系的众多利益。
- 直截了当地表明，一个和平安全的中国和一个向人民负责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一个负责任和肯合作的中国和一个愿意遵守国际准则和机制，与大



家共同分担处理区域和全球问题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一个繁荣与开放的中国和一个愿意吸收外来的进口与投资而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动力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一个能进行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和一个及时关注国内弱势群体并限制发展对地方、区域和全球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

- 美国应当与其他国家紧密合作——尤其是日本与欧盟成员国——来实现以上的目标。
- 总统应当坦率地承认目前美中关系中双方相互猜疑，并呼吁两国采取步骤以加强相互理解和信任。

## 识别核心利益

从与华盛顿交往的初期开始，北京就一直试图表达它的核心利益——例如台湾问题——并要求华盛顿也如此做。美国应当向北京明确说明其核心利益，因为中国以往的记录显示当它了解什么对美国是至关重要时，它对美国的关注就比较有反应。本工作组建议美国应该着重于以下几点：

- 改善经济关系；
- 加强安全关系：建立相互理解与合作；
- 加强不扩散的努力；
- 鼓励政治改革、法制和对人权的尊重；
- 保护全球环境和提倡可持续能源政策。

这些核心利益没有先后顺序。它们都同样紧迫——例如，北朝鲜可能会出口核武器与核技术的风险和全球气候变暖对地球造成的威胁。美国和中国在争取国内对两国全面关系持久的政治支持时，这些核心利益都同等重要；所有这些议题可以也应当在同时处理。美国的这些目标与中国的基本国家利益完全没有冲突。实际上，它们与中国长期成功地扮演负责任大国角色的目标是一致的。就连一些比较棘手的目标——促进对人权的更大尊重和政治改革——都与中国明确表示的国家目标一致，这些目标包括中国希望保持经济上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与平等、打击腐败以及为与台湾和平统一打下必要的基础。要在一些问题上——例如，环境保护——取得重大的进展需要时间。但是本工作组认为，任务越艰巨，美国越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努力。

## 改善经济关系

理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需要美中各自的国内改革和双边举措，还需要美国努力使中国更完全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美国对华的最核心目标是保证中国继续进行宏观与微观经济改革。使中国更好地履行对世贸组织的义务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国内的改革进程，但也需要有其他的步骤使双边的经济关系能在健全的基础上发展。

首先，处理美中经济关系与在美国国内的经济政策是牢不可分的。美国需要通过削减赤字、提高储蓄率、减少消费、加强小学与中学教育及投入技术创新等手段先理

顺自身的经济。当美国有三分之一的高中生无法毕业的时候<sup>50</sup>，它就不可能在今天全球“知识时代”的经济中脱颖而出。要公众支持能为美国带来无数财富的开放贸易，美国就需要实施更有成效的劳动力市场调整项目，以帮助那些因为全球化所带来的快速变化而受到负面影响的人<sup>51</sup>。最后，美国应当在不向中国或其它外国投资建立壁垒的情况下保障美国的安全利益。当不会造成美国安全威胁的外国公司向美国公司采购时，美国如果对他们设立障碍或威胁要设立障碍的话，例如美国对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欲采购加州石油公司（Unocal）时的反应，那它在国内外推动开放投资政策时就不可能让人心服口服。

第二，本工作组相信美国应该帮助中国制定一个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建立一个“社会保障网”是这个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医疗、财富、教育与养老方面的开支自然会提高个人与政府的消费，进而减少储蓄。政府也应当实施金融改革使大家更容易获得房屋贷款、商业保险、汽车贷款及其它消费者融资方式（包括信用卡）来支持更多的消费。美国应当在这所有的领域与中国分享专门的技术为中国的转型提供方便，同时美国应当给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它打开金融服务部门，允许更多的国际竞争，让最好的服务进入中国经济的这个至关重要的部门，进而带来竞争。

第三，有关中国需要让人民币像美国与欧盟的货币一样按市场机制浮动，美国应当扩大这方面的讨论。中国关注货币价值对其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但会考虑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在改变货币价值方面可能的动作，对调整人民币重新给与评价。美国应当敦促亚太经济合作论坛或 20 国集团的财政部长将全球失衡的风险与补救办法作为优先事项来处理。如果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允许它们的货币随市场力量提升，这将有助于减少这种不平衡。中国方面，人民币的升值将减少对中国出口的间接补贴和减少进口消费货物的成本，刺激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这将缓和中美双边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四，本工作组赞赏美国最近所启动的贸易和经济方面的高层谈判，例如有关汇率的灵活性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这些倡议应当继续得到加强，由美国提供清楚确实的数据以表明美国所敦促的政策改变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这个对话应当对准最近美国贸易代表所提出的“从上到下审议”贸易关系的广泛目标<sup>52</sup>。美国贸易代表突出了六个目标：

---

<sup>50</sup> Jay P. Greene and Greg Forster, “Public High School Graduation and College Readiness R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公立高中生毕业率和可上大学率),” Education Working Paper No. 3, the Manhattan Institute, September 2003.

<sup>51</sup> 2002 年通过的贸易调整援助法案并不适用美国占有劳动力 80% 的服务业人员，也不适用那些受到贸易负面影响的工人，而这些贸易又都是来自与美国没有贸易协议的国家。此外，该援助一万元的上限也进一步削减了该项目的成效。

<sup>52</sup> “U.S.-China Trade Relations: Entering a New Phase of Greater Accountability and Enforcement (美中贸易关系：进入一个责任追究更强、执法力度更大的新阶段),”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February 2006.

- 让中国更全面地纳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国际贸易体系。
- 更严密地监督中国对世贸组织义务的履行。
- 严格地执行美国的各项贸易法。
- 获得中国市场更大的准入并敦促中国进行更大的经济改革。
- 加强美国的出口鼓励措施。
- 加大识别和解决贸易问题的力度。

第五，为了鼓励对知识产权有更大的尊重，美国政府应当根据美国商会已经使用的评级制度再订立一个评级制度，引导美国公司到知识产权保护表现较好的省份去投资。在与中国当局讨论时，国会的威胁也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因素，但是奖励措施总是比惩罚性措施更有成效，特别是因为全球的技术市场非常具有竞争性，而且通过多边谈判来惩罚知识产权的违规者也很不容易。

第六，美国应当继续鼓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GPA）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作为中国对国际贸易安排做出承诺的下一步。将中国纳入GPA体系将为美国产品出口到中国排除一个主要障碍。对中国这种政府有极大作用的经济体，这一点特别重要。目前，中国的政府采购标准和指导方针显然是偏向照顾国内的公司。

第七，美国应当说服中国不要去发展可能会趋向排除美国或歧视美国公司的地区性体系来代替国际货币基金或世界贸易组织。要做到这点，美国应当确保中国的声音能在世界金融机制的管理过程中被听到，同时确保美国或国际金融机构本身不忽视亚太地区面临的挑战。

最后，美中应当制定一个把中国纳入八国集团的路线图。与让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想法一样，美国应当促进中国纳入对国际事务有重大影响的组织。中国过去的记录显示，中国若被邀请加入制定规范的团体，就比较不会与国际准则脱节。虽然八国集团是个非正式的团体，不存在行政方面的结构或秘书处，它毕竟在世界领先的经济体之间就广泛的问题协调政策，包括公共卫生、执法、外交事务、环境、恐怖主义及贸易。中国可先在“八加一”的框架下，以观察员和对话伙伴的身份参与八国集团，这将清楚地表明美国希望见到中国与世界居领导地位的国家一道工作，一起来面对全球气候变暖，更好地在南非除贫，倡导良好治理这类挑战。使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进入八国集团将增加这个集团的合理性。而且，对中国申请最终成为八国集团的正式成员进行讨论将会使美国有机会鼓励中国进一步改革经济和政治。

### *把出口管制与制裁作为筹码*

利用出口管制和制裁限制先进技术流入中国的作用是有限的。美国应当只限制其最敏感的军民两用技术出口到中国，同时尽量与其亚洲和欧洲的盟友一同做到这一点。单方面对技术的出口实施制裁的效果不大，而对低技术实施制裁完全没有意

义，因为这样的技术随处可得。而且，美国不应当企图利用制裁来影响中国国内的事务。制裁的作用根本不大，又让外界认为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怀有敌意。

作为美国整体外交战略的一部分，出口管制能见效的领域包括促进国防问题的透明度和促进中国在全球不扩散的合作。*美国应当提出放宽管制来换取中国的行为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包括不扩散的目标和国防问题加大透明度。如果中国的对外政策违反了国际准则或中国支持会破坏美国安全利益的国家，那么美国应当毫不犹豫的加强管制。*

## 加强安全关系

施伯乐教授（Robert A. Scalapino）曾经说过，美国促进其在亚洲的利益所使用的战略应当是即强调势力均衡，又注重大国协调的战术。*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利益不被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所削弱，美国的上策是保持其在航天、航空及海上的优势，同时加强并维持与东亚盟友的关系。*但是美国在继续推行本身的军事现代化，并加强与中国邻国的安全关系之同时，也应当推动与中国的军事对话、增加透明度及协调工作。

### *持久的军事能力*

美国应当保持并有选择性地加强它在东亚的军队态势，以保证在该地区对美国的经济和其它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越来越重要时，它的力量可以相称。美国在关岛的军事设施应当继续得到改善，这样做不仅能分摊一些冲绳岛的负担，也能够使美国在太平洋的总的军事力量升级。美国应当继续广泛地对下一代技术进行投入，以适合太平洋战区的需要，特别是先进的航天航空与海上部队。美国也应当改善对中国军事的信息收集与分析质量。这将需要对有中文语言能力的情报专家进行培训。

最后，美国还应当认真考虑把海军的中心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出于历史和后勤的考量，现在海军力量在这两个海域算是平均分布。未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海上利益不断扩大，因此美国海军的驻防也应当与此趋势配合。

### *与中国的邻国合作*

美国不应该为了加强美中安全关系而失去美国传统的盟友。相反的，与中国建立相互了解和信任需要有盟友的积极支持。东亚缺乏任何有效的多边安全结构，因此*由美国带头的中枢辐射体系应当得到加强而不是被放弃。*但是这种联盟也需要进行现代化，使中国有参加的空间。美国不应当让其盟友陷入必须“选择”美国或是中国的为难处境。具体地说，美国应当：

- 继续调整美日联盟，从基于共同威胁的*排他性*双边主义渐渐走向基于共同利益与价值观的*扩展性*双边主义；

- 积极地寻求美日中三边讨论的机会；
- 更好地协调美韩日的安全策划；
- 更多关注东盟、东盟区域论坛及亚太经济组织。在这方面，美国应当任命一位高层官员作为新设立的，由国会授权的美国驻东盟大使。
- 与东盟成员国一道将中国引入一个拥有建设性安全关系的网络，该网络的焦点是海上安全、国防策划与行动的透明性及领土争端的解决。
- 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sup>53</sup>和参加东亚峰会，至少能确保美国在所有东亚主要多边机制中继续产生影响力；
- 加强在该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重振与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的关系，并寻求与越南和柬埔寨建立新关系；
- 与印度建立更深的军事伙伴关系，但是必须符合印度自身的安全优先事项，同时尽量避免使人误以为这样做会在军事上给中国带来威胁。探讨美中印举行三边安全对话的可能性；
- 寻求以观察国身份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借此维持与在反恐战争中站在前线的中亚国家的合作，并防止该组织成为一个“反美”团体。

有些看法认为美国因要照顾到众多地区而对亚洲不再感兴趣。以上所提的步骤将可改变这种看法，也将为美国提供机会就如何改善美中关系与亚洲伙伴国进行不公开的对话，目的是在该地区开创正式和非正式的安全关系，鼓励中国在对外政策上能与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对外政策相互协调。

### *建立相互了解与合作*

加强美中安全关系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中国达成谅解，使中国知道，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地位和美国的联盟不是为了威胁中国或是寻求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鉴于美国目前在军事上享有很大的优势，鉴于中国目前对国内发展和稳定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外部的探索，本工作组相信，美国可以与中国发展一个坚实的、能够减少不健全竞争可能性的安全关系，这种关系符合两国的利益。

至于中国渴望登上大国地位这一点，美国将设法发出信号让中国知道，美国欢迎中国在区域和全球安全事务上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强，同时也要寻求北京了解与理解，美国将继续起领导作用。其中一个做法是邀请中国观察和参与由美国领导的联盟活动。这种做法应该是互惠的，借邀请中国参加泰国金色眼镜蛇一类的军事演习，使美国能有机会参与俄中的双边演习或上海合作组织的区域性安全活动。

---

<sup>53</sup> 该条约于 1976 年 2 月首次签署，很具体地在法律上约束所有的签署国遵守和平共处、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及不使用武力这些原则。这是东盟的基础文件之一，同时只有签署该条约的国家才有资格参加东亚峰会。2005 年 12 月参加首届峰会的 16 个国家包括了东盟的 10 个成员国加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及新西兰。

加强安全关系的第二个目标是在共同关心的军事问题上扩大与中国的合作，包扩广泛的区域安全，打击恐怖活动和海盗，对区域的人道灾难做出反应及支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促成与中国更紧密的安全关系需要建立起合作与协作的惯例，从而减少两国间的相互猜疑，拓宽双方的利益空间。*美国应当发起一个有持续性的高层军事战略对话来辅助于 2005 年启动的副外长级高层对话及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于 2006 年发起的战略经济对话。

在与中国的安全对话中，美国应当：

- 为布什总统与胡锦涛主席于 2006 年 4 月所宣布的核对话注入活力，进一步了解对方的核原则，包括进攻性和预防性武器系统的作用与能力和如何避免太空武器竞赛。
- 继续鼓励国防策划、采购与预算的透明性。
- 要求人民解放军给与“价值相等”的交流互惠，包括要求人民解放军让美方人员到中国不同的地点访问和会晤在不同专业里最优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员。
- 以比较没有争议的交流为基础，将合作关系发展到有较多军事内容的领域，例如就朝鲜半岛事务（如两年前发生在鸭绿江附近的爆炸事件或是海上事件）和反扩散问题进行协商。
- 在议程中加上危机处理的讨论，从 EP-3 事件中吸取教训，讨论危机触及两国军队时的处理办法。

随着美国与中国建立起更有实质性的军事对话，美国应当寻求与中国在国际安全领域中有更大的功能性合作，包括下列各种任务：

- 国际搜救行动；
- 多边人道救援；
- 反恐行动；
- 防扩散行动；
- 非作战撤退；
- 打击海盗、贩毒及人口走私活动；
- 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维和行动。

## 军事对话

有关扩大军事对话的建议需要进一步阐明。美国应当努力取得对方理解，即各方军事现代化的项目都将有针对性，目的是避免可能会威胁到对方的核心安全利益的动作。本工作组预见，这种安全对话不会发展成为正式的军控会谈—本工作组认为有许多因素使这种会谈不切实际，因为美中力量不平等，美国对盟友有义务，同时既要影响华盛顿履行全球承诺的能力，又要限制能够打击中国的美国军事力量，这是很困难的。但是军事对话的性质应当是战略性的，并且应着重于战略武器系统—

核武器与导弹防御体系。对话的内容也应当包括在双方发展各自的战略态势之同时，双方愿意作出什么样的克制。专家级的讨论应该是集中在一系列问题上，包括以下几点：

- 国际核环境；
- 核原则；
- 导弹防御与中国在台湾对岸的导弹部署；
- 危机发生后如何不让它升级；
- 核部队的层次和组成部分；
- 先进的常规兵力投射系统，如空中加油队、海军两栖行动组、空中作战及全球监视与侦察系统。

要消除相互猜疑和鼓励中国调整其常规与核防御系统现代化，以便使其与北京宣称的有一定范围的国家安全目标一致，进而减少美国扩大军事态势的压力，这是不容易的。打个比方，美国是否应当向中国保证，美国的导弹防御能力将不会抵消中国的威慑能力并对这种保证提供证据？条件是什么？本工作组建议美国利用刚启动的战略核对话来探讨这个问题，同时美国应当准备好就导弹防御与中国分享数据，条件是中国也做出回报，就中国自身的战略部队和现代化的目标与范围与美国分享信息。

### *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

自从尼克松访华之后，台湾一直是华盛顿和北京的安全关系中最关键的问题。本工作组建议美国加强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努力，以降低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并减少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破坏性影响。与中国制定一份新的“公报”或是就台湾的地位另外制定一份正式的“临时性协议”不但可能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制造更多新的问题。美国应当继续实行“双重制约”和“双重保障”的政策，遏制中国的侵略和反对台独行为，同时向中国保证美国不会谋求台湾脱离大陆，也向台湾保证，美国不会向其施压强迫它与大陆会谈以达成最后决议。此策略的内容包括：

- 在东亚前方部署和保持强大的军队并向北京明确说明，美国时刻准备履行在《与台湾关系法》中提到的，与安全有关的义务<sup>54</sup>；
- 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台湾单方面改变现状；
- 继续对台出售武器（包括导弹防御系统），以加强台湾遏阻中国攻击和对抗中国胁迫的能力；
- 继续向台湾表明它有必要改善自己遏阻中国侵略的防御能力，且在国防资源的运用上要审慎，同时反对台湾获取任何攻击性的威慑武器，特别是核武器；

---

<sup>54</sup> 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第3条（甲）：为促进本法第2条规定的政策，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根据第3条（丙）：兹指示总统将对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威胁并由此而产生的对美国利益所造成的任何危险迅速通知国会。总统和国会应依照宪法程序决定美国应付任何这类危险的适当行动。

- 坚持海峡两岸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是和平的、非胁迫性的。

本工作组建议，美国应更明确地表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国应当清楚理解美国不排除使用武力来挫败任何中国通过武力强行统一的企图。同样的，美国应当向台湾政府表明华盛顿不支持台湾独立，而且台湾若挑起危机不要指望美国采取军事干预行动。

鉴于海峡的局势存在着潜在的危险，美国可以采取一些有限度的步骤来鼓励更紧密的两岸关系。美国应当：

- 继续敦促中国与台湾在言词上降温，建立贸易、旅游及通讯的实际联系，以平等的地位，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举行直接的政治对话。
- 鼓励两岸采取军事信任和安全建设的措施。
- 继续主持二轨三边会谈，让来自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学者、退休文官和退役军官及公众人物在低调的背景下讨论关系，加强它们之间的关系，希望借此减少在沟通上误解和在决策上误判的可能性。几年来至少已经有三个这样的倡议在进行着。
- 谢绝充当台北与北京之间的斡旋者，也不为解决海峡两岸分歧的具体方案背书，因为这样的做法会引起反效果。但是，如果两岸要求，美国可以考虑提供方便，起促进者的作用。

最后，本工作组注意到斯坦利基金会已经启动一个二轨对话，参加者来自美国、中国与日本，讨论的问题是可实施的建立信任与建立安全的举措。只要美国认为这个倡议所引发的任何想法有助于在台湾海峡出现危机时减少误解或误判的风险，就应当接受。

## *中国与日本*

美日联盟仍然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联盟体系的基石，而美国也依赖美日联盟促进美国在东亚和更远地区的利益。美国应当继续加强美日联盟以应付冷战结束后一系列的全球挑战。

要使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的战略取得成功，美国必须与其盟国日本步调一致。只要中日关系因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遭到破坏，日本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的能力将是有限的，而日本在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努力（这也是美国所提倡的）总会引起北京的警觉。因此日本与中国之间建立更具有合作性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东京与北京的核心分歧牵涉到荣誉、历史、民族尊严及恐惧，另外还有两国在势力和影响上的竞争。这一切的问题最终需要一个双边的解决方案——或最起码双方要达成某些程度的妥协。但美国在这方面有它的作用。美国应当：

- 鼓励东京与北京之间的对话，以便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解决分歧，达成真正的和解。



- 敦促两国找出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贸易与投资、核能、环境及反恐——并以这些领域为基础发展关系，而不是强调分歧。
- 接受日本希望成为一个更有作用和更投入的全球公民的雄心，并私下表达华盛顿的看法，就是日本要起这种范围更广的全球作用就必须改善与北京和首尔的关系。
- 在不卷入领土争端的情况下，提供“斡旋”，促进中日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对话，如海上安全、能源安全、反恐及防扩散领域。

### *加强防扩散的工作*

美国目前面对两个明显的防扩散挑战：北朝鲜和伊朗。用更广阔视野向前看，美国需要中国一方面与他国一道巩固不扩散的准则，一方面中国自己也必须遵守这些准则。

美国应当继续就北朝鲜的问题与中国合作，即使美中两国有时候对利益的优先顺序有所不同或使用的战术有异。要解决北朝鲜的问题需要“亚洲的大棒”和“美国的胡萝卜”。最近所取得的进展是令人鼓舞的，但大家都承认那仅仅是起步，是“开始的开始”而已。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在去年一年特别明显。要鼓励中国继续起这样的作用，美国应当在对北朝鲜的政策上加上一个战略性的内容：

- 在与韩国和日本的紧密协作中，美国应当寻求与中国在朝鲜半岛的长期目标上取得共识，也就是在朝鲜半岛上建立持久和平，然后支持南北双方以自己的条件和根据自己的时间表进行统一，没有核武器，也没有美国前方部署的庞大的地面部队。

美国在面对北朝鲜的挑战时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合作所使用的一些手段应当也适用于伊朗。中国与美国在伊朗的问题上利益是不一致的，不过在某些方面也有相同点。中国反对伊朗发展核武器，但是不认为伊朗的核活动会给中国带来特别的威胁。中国甚至可能不相信伊朗正在寻求发展核武器。中国也希望在中东扩大影响力，特别是在盛产石油的伊朗。中国与伊朗有深远的历史关系，在当代的经济、政治及军事上有重要的联结点。中国对伊朗政府没有美国政府那样的反感，而中国也明确反对对伊朗实施制裁。与北朝鲜的情形一样，美国需要做许多工作才能说服中国与美国和欧盟紧密合作来制止伊朗的核野心。这些工作包括就伊朗发展核武器的野心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让中国了解美国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包括与伊朗官员直接会谈），把核问题（而不是其他美国认为是令人忧虑的伊朗行为）作为优先事项，并对中国的合理的利益表示理解（比如中国非常依赖伊朗的石油出口来满足国内的能源需求）。

追根究底，北朝鲜和伊朗问题更显示出在全球防扩散的议程上与中国建立更紧密合作的必要性。对违反美国不扩散法的中国公司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可能有助于制止某些公司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在促使中国政府对美国的防扩散目标给予更广泛支持方面成效不大。美中应当讨论如何加强核不扩散条约，包括全球如何管制裂变物

质的生产与储存。美国应当扩大与中国的军控官僚体系的接触，双方共享得到适当保护的情报信息，为双方合作性的防扩散举措提供方便，特别是如何防止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美国应当为中国的军控专家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

## 鼓励政治改革、法治及对人权的尊重

使中国与国际接轨的其中一个战略是把中国引向对国际人权准则给予更大的尊重，包括对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尊重。加强对法治、人权的尊重和促进民主化进程需要时间，因此更需要美国为完成这些目标一贯地、积极地工作。现在有很多因素在驱使中国走向更多元的社会，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仍然抗拒基本的政治改革，认为这些改革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威胁。美国应当提出相反的论证：对人权更大的尊重将确保中国的经济成长、社会稳定和政治合法性，而不是相反。美国处理人权的手段也需要涉及多方面。

首先，美国今天应该重新以身作则。美国因为本身没有实践它自己制定的法治和尊重人权的理想，因此在向中国提出人权议题时就不能理直气壮。美国提倡人权的对象不应只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的老百姓本身。中国人民最终才是政治改革的建筑师，也是人权在中国最有成效的提倡者。美国政府不是唯一的，而且也经常不是最有效率的自由思想和理想的提倡者。非政府组织、大学、公司、个体公民、国际组织、互联网及其他手段在向中国传达所期待的行为准则方面可能会相当有成效。跟过去的独裁专制政权相比，今天的中国对外界的影响开放多了。

第二，从实践的角度看，美国若想在中国国内促进人权，最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中国建立最能增加政府透明度和责任追究的机制，包括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一个自由与负责任的媒体及一个专业、独立的司法体系。美国应当扩大在这些领域的培训与宣传项目，不仅是在国家一级，也在地方一级这么做，因为地方一级的实践往往落后于国家所支持的做法（即使国家一级本身也仅仅是落实书面上的支持）。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财政支持应该持续和扩大。即使美国认识到双方就算合作，美中的目标还是存有差异（中国希望通过改革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和有效性，而美国希望通过改革打开中国的法律和政治体系，让中国人民能更进一步向这些体系追究责任），美国还是应当如此做。

第三，作为中国劳动力生产的产品的最大消费国，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劳动的条件表示关注是合理的。美国公司应当继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CSR）项目，向美国消费者保证他们所购买的产品是在遵守国际和中国法律的情况下生产的。正如美国政府要求金枪鱼肉贴上“非海豚肉”的标签的做法一样，政府应当探讨如何推广由遵守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最高国际标准的中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也就是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推动对劳工条件的改善。

第四，当美国决定批评中国的行为时，它不仅应当坦率地在不公开的会谈中将问题作为双边议程的一部分提出来，也要在合适的公开多边场合中——如日内瓦的联合国

人权委员会——提出问题，而且要非常留意国际准则和礼节来做。这不仅是一个表述的问题。在如何对待公民的事上，中国已经对一系列的国际标准和义务做出了承诺。美国如果能够提醒中国它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并能够表明美国对中国在行为方面的要求标准和它对其他国家的要求标准是一样的，那么美国的人权观就更有坚实的基础。

第五，美国应当劝阻中国不要对互联网进行审查和控制。如果中国不放宽对媒体的管制，美国通过“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及其它渠道向中国听众广播新闻和信息的努力就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支持。通过与民营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合作，美国应当实行多边努力，制定一个互联网运作的行为准则方面起带头作用，内容包括当互联网内容受到控制时进行调查和对隐私权的保护。

总的来说，当美国就人权问题与中国接触时，其做法应该是支持中国成为一个更开放、更透明及更有人道的社会，帮助中国实现下述目标，即促进经济增长、加强社会稳定、创造和谐社会、改善与台湾的关系及巩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美国应当坦率地指出，只要美中对人权问题的看法有分歧，美国在寻求与中国建立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样的伙伴关系时就会有一个上限。

## 西藏

有关西藏的问题，本工作组建议美国继续鼓励北京直接与达赖喇嘛对话并欢迎他回到中国，特别要注意到他倡导不使用暴力，同时冒了相当大的政治风险放弃了寻求西藏独立的主张。呼吁对话的声音应当提升到更高级别并列入两国元首会议的议程。而且，美国的西藏政策协调者应当重新努力到西藏进行正式访问并视察那里的实际情况。中国似乎只有在在不对话会使问题国际化和会玷污它在全世界的信誉时才考虑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对话。

## 教育

在加强对中国的影响力方面，美国可以采取的一个比较重要但比较不引起注意的步骤是为美国人提供更多对中国研究方面的教育和扩大美中教育交流。因此，美国应当选在“1958年国家国防教育法案”（NDEA）50周年纪念日时启动一个新的倡议，加强美国对中国的理解和与中国的交流。这个新的国家国防教育法案可以：

- 赞助一个全面性的国家教育计划，向新一代的美国人在中国的语言、历史、经济、政治及文化上提供训练。许多教育机构正在继续和扩大这些项目，不仅是在大学里，也在小学和中学推动，而且经常是与非政府组织（如亚洲协会）和私营企业合作。本工作组建议美国联邦政府应当在这方面大量增加资金。
- 大量增加奖学金的数量，以提供给希望到美国进行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合格的中国学生。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学生在未来的年代将是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前锋。

## 保护全球环境和提倡可持续能源的政策

能源与环境是中美两国在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发展关系时的两个比较有希望的领域。地球的命运有赖于美国与中国成功地控制对人类有害气体的排放。一个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可以一道向全世界证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并非是互不相容的。美国应当呼吁中国，通过和全球一起努力对抗气候改变，向外界显出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

美国会发现，中国如果认为美国本身也致力于环境保护的话，那么它就会比较愿意在改变气候变化方面与美国合作。这些环保领域包括：在国际间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共同努力，奖励在制造和建筑设计中采用“绿色”技术的企业和消费者，提倡节省能源和回收，改进汽车燃料的效率，推广燃料混合型和其它对环境无害的排气低的汽车及为另类能源的基础研究提供基金。*美国政府如果本身不能完整地、不含糊地接受人类活动确实是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联的话，如果不与其他国家一起寻求多边解决方案，那美国就不能期待中国和全球一起来对抗气候的改变。*

作为全世界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中两国有共同的利益，都希望能有可负担得起，生态上可持续的能源。在许多有关的技术上，美国在全世界是佼佼者，这使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显得加倍有吸引力，因为这样做可以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同时又可以控制能源的成本和净化环境。比方说，财政部长保尔森于 2006 年 12 月访问北京时，中国就宣布它选择了东芝和东芝在美国的西屋电器公司兴建 4 座新的核能反应堆，这是将来可能要兴建几十个核能反应堆的第一批。该笔交易估计将达到 60 至 100 亿美元，而且还不包括后继的采购和维修合同。而这仅是冰山的一角而已<sup>55</sup>。

有鉴于此，本工作组建议美国要大力加强美国能源部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合作，美国国家科学院与其中国对口单位的合作。合作性的研发和向中国介绍新技术会有成效的领域包括：

- “清洁”煤发电厂和先进的沸水核子反应堆；
- 节能灯和电器；
- 太阳能技术和有关应用技术；
- 燃料混合型和氢气汽车驱动系统；
- 减少工业设施有害排气的先进系统。

---

<sup>55</sup> 机会确实是不可限量的。例如，由 Shih-Ger Chang (Ted)所带队的伯克利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已经开发了一个可以把水银从燃煤发电厂的排放气体中分开的方法，在价格低廉和效率方面十分有潜力。该工艺可以防止毒素侵入环境和侵入最终到达我们餐桌上的食物链。虽然 Chang 的“劈水银”工艺仍在研发阶段——但它已在前不久被一家在旧金山湾区的名为 Mobotec USA 的工程公司申请到[专利]许可。这家公司将进行预研工作——初步的实验室结果显示它拥有成功控制污染的技术。

本工作组也建议美国鼓励中国加入石油消费国的多边能源对话，包括为中国融入并最终加入国际能源署（IEA）提供方便。中国还不是 IEA 所隶属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中国目前也没有一个长达 90 天的战略石油储备——那是加入 IEA 的一个条件（中国有大约 45 天的供应量）。但是中国可以通过“实施协议”在不同的领域中与 IEA 合作，包括能源技术、环境保护、能源效率及[能源]多样化。美国应当与中国和日本一道探讨创造一个东亚地区能源储备的方法，让其成员国可以在紧急时刻获得能源供应<sup>56</sup>。

---

<sup>56</sup> 有关美中关系中能源问题和有关中国可能加入 IEA 的可用分析，请参看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kka Herberg, “China’s Search for Energy Security: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中国寻索能源安全：对美国政策的含义),”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Analysis*, Volume 17, No. 1, April 2006。

## 结论

前面的分析是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走向做出评价，重点是放在中国的发展进程到底对美国的利益意味着什么。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今天中国人民总的生活水平远胜于过去几代人的生活，而且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极有可能会持续下去。中国将骄傲地主办 2008 年奥运会，急于要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

但是中国仍然面对许多重大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与资源才能有效地得到解决。因此，中国的领导人需要也期望国内外（特别是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环境，让中国有战略的喘息空间来应付国内的挑战。

正因如此，中国的领导人也需要与超级大国美国保持稳定的关系，即使这种关系谈不上友好。为了保持友善的双边关系，中国会尽量采取美国希望它采取的步骤，除非中国认为这些步骤与国内稳定、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目标相抵触。美国不应避开中美利益相异的领域。美国必须随时准备好，甚至在有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来保障它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但是保护美国大部分利益的上策是制定和实施一个可以扩大与中国有共同利益领域和缩小与中国利益相异领域的战略。

自从尼克松总统打开到中国的大门之后，中美关系一直在经济上和战略上为美国，也为中国带来利益。但是在 11/9 和 9/11 之后（柏林墙于 1989 年 11 月 9 日崩溃；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了恐怖攻击事件）的全球化时代，虽然两国的合作方面增加了，但人们在取得政治共识，制定一个合适的对华政策方面却是压力重重。重新达成这种共识是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总统的一个重点任务，因为要有成效地处理美国今天面临的挑战——无论是反恐、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散布、约束北朝鲜的核野心、保证能源安全或保护全球环境——有中国的合作要比没有好。事实上，有许多问题如果没有中国有积极性和建设性的参与是办不好的。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与冷战时期的挑战同样值得我们留意，美国当年就知道，促进本身的利益也需要朋友和伙伴。

中国的未来并不确定。美国可以从看到一个大图景——中国要继续经济发展和处理迫在眉睫的国内问题，需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并与美国合作。但是连中国人自己也无法确定中国会选择什么道路。美国的目标是明确的：进一步让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最有希望影响中国的利益与行为，使其在安全、贸易、金融及人权方面与国际准则保持一致，也最能促使两国在面对同样的挑战时进行协作。美国需要尽最大的努力扩大与中国合作的领域并减少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美国最终安全是根基在于美国国力——军事、政治、经济与道义——的基础上，而本工作组相信这种国力是能持续下去的，这就给美国足够的时间和手段在必要时对中国的政策做出评价和调整。美国应当站在一个充满信心的地位上，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中国。

## 附加与不同意见

*哈洛尔德布朗 Harold Brown (林蔚 Arthur Waldron 附议) :*

我同意本报告的分析、结果和建议，但我也同时感到报告的语调过于乐观。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美处理两国关系时要避免敌对的后果是很困难的。中国领导人的首要目标似乎是：第一，保持共产党在政治权利上的国内垄断；第二，（与第一有关），维持中国内部稳定和经济的和平发展；第三，让这样的经济发展渐渐把中国推上世界强国的地位，彻底改变过去一百五十年来内部衰弱和外族压迫的历史。

已经确立地位的大国和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从来不乐观。就本报告的重点来说，两个国家内部已有重要的声音出现，认为对方要不就是决心压制自己的崛起，要不就是搞破坏或是想取代自己。紧密和强化的经济关系可以成为在政治上合作的理由，但也可以成为争端的起因。两国虽然有共同利益（如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但也有相互抵触的利益（如在东北亚相对的影响力）。而且两国政治体系的迥异也加剧了其他方面的摩擦，使解决某些争端更加困难。

这一切并不表示敌对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确实说明，如果美国在中国的政策进程和发展过程中要发挥肯定是有限但积极的影响力的话，美国需要对涉及的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有更娴熟的处理技巧。而最近几届政府在这方面显然做得不够。正如报告的最后一段所指出，就连中国人自己都不确定中国内部发展的未来道路，而这条道路却是决定中国是否真正和平崛起的最重要因素。

*亚伦弗里德伯格 Aaron L. Friedberg:*

我同意工作组的报告中有关中国卓越成就和所面对挑战的许多观点，但在两个关键的战略问题上我持不同意见。

报告正确地指出美国政策的内容必须是接触（或整合）加上制衡中国日益强大的力量，但是我认为报告低估了后者的艰巨。中国持续和广泛的军事发展已经使它有更强大的力量在西太平洋地区向美国的军事优势挑战。美国要保持对它有利的势力均衡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当亚洲和中东地区都同时需要因此分散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时尤为不易。

这也不仅仅是军事竞争的问题。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扩展正在使它更有能力讨好邻国（包括一些美国的传统盟友），并提倡新的、其目的是排挤美国的区域组织。因此，美中两国一方面在进行对话和贸易，另一方面也在进行严肃的战略竞争。过度夸大这一错综复杂的关系是错误的，但忽视它或期盼它自我消失也同样是错误的。

我还认为，本报告对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存在深刻政治分歧的重要性未免有些轻描淡写。这些分歧确实限制了双方建立“紧密、坦诚和合作关系”的能力。美国人永远

不会完全信任一个限制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及政治竞争的政府。同样，中国现任的统治者由于惧怕，也将继续提防美国利用促进民主的“和平演变”来取代他们。除非这两个太平洋大国在价值观方面有更大的共同点，否则任何利益的汇合都将是有限和脆弱的。在这方面过分乐观会带来虚假的希望，结果就难免失望，最终导致反弹。

*莫里斯格林伯格 Maurice R. Greenberg (赫伯特雷文 Herbert Levin 附议)：*

我签署了这份报告，因为作为一个整体文件来说，报告中多处有关美中关系问题的观点有助于增进了解，进而有助于建立更好的关系。就我们的目标和中国的目标进行坦率的讨论有益无害。

但是，我不同意报告中一味地敦促中国民主化。我从1975年就开始到中国去，目睹了中国不仅是在经济方面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也目睹了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变。

各国文化各有差异，其政治体系也是由自身的历史塑造而成。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主不会因外部的压力而出现，而会从内部产生。就中国来说，如果中国一直存在政治动乱的话，我很怀疑它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还能取得这种惊人的进步。

我们应当停止敦促中国接纳民主政治体系——这个决定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如果出现了民主，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通过高层对话在重要的问题上了解对方的意图是有必要的。透明也是有必要的。两国必须明白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总是会存在分歧，但是那不应该阻止美中两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

*何汉理 Harry Harding (Arthur Waldron 附议)：*

虽然总的来说我认同本报告的分析与建议，但是美中关系中一些其他的问题本该讨论得更详细。

其中一个被忽略的问题是经济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抬头。反映这种情况的例子包括：中国更严密地限制外国公司在中国经济的战略部门中获得所有权，认为外国公司占了太大的市场份额或控制太多专利的抱怨日益增多，以及一些外国公司被有选择性的指控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和规定。中国政府在关键产业中推广“国家领头羊”也反映了其经济民族主义，例如最近所宣布的鼓励中国的航天工业在大型客机的制造方面与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集团竞争。

这些趋势引起我们的关注，即在中国国内的商业气候对一些外国公司越来越不利，同时美国和跨国公司也将在中国市场和在第三国市场面临更多的竞争。从某一方面来看，当一个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成功地进行现代化时，公司间出现这种竞争是正



常的。但是，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结果也反映了中国政府的一套刻意制定的政策，即限制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机会并促进中国公司在外国的营运利益。

另外一个或许也应该得到更详细讨论的问题是，在中国国内或以中国为基地的有组织的跨国犯罪行为正在增加。这些罪行包括贩毒、各种来自中国或流向中国的产品走私（例如流入中国的木材和来自中国的盗版光盘和假冒时装产品）、非法移民及贩卖人口（特别是妇女）。这个新兴的问题应当成为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广泛合作的基础。

最后一个我认为应该受到更多注意的问题是如何加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以及如何改善美国人讨论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式。我支持本报告所倡议的一个教育项目，即在中小学和高等学府中促进对中国的了解，但是我认为应该更进一步地将其扩大为对整个国际事务的了解。同等重要的是要改善在公众论坛和在美国的政策圈中讨论中国的方式。政策上的辩论在提到中国时经常都是非黑则白，不能反映中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关中国未来的公众讨论也经常是夸大和没有条件的——说中国会崩溃、中国会民主化、中国会在亚洲寻求霸权主义——这些说法都没有足够地认识到中国未来的真正不确定性。有关中国的辩论经常都被两极化或感情化，同时参与辩论者则被戴上“辩护士”或“冷战斗士”的帽子。我们如果要有成效地面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与机会，那我们对中国的了解需要尽可能是知情的和有水平的，我们的辩论也需要尽可能是尖锐和合理的。

*甘维珍 Virginia Ann Kamsky:*

本报告在展望美中关系的未来时，谨慎地考虑到了应该乐观和应该关切的原因。我们美国人必须记得，中国政府每向前踏出一步，美国也要在政策上进行相应的改革。要通过对话，而不是用带有殖民主义的教训口吻和双重标准才能保证一个互利的关系有前途。

作为促进中美之间跨文化的了解和对话的一个基本要求，本报告建议在促进研究中国方面扩大项目投资。这一直以来是像华美协进社这类组织的工作重点，如为三岁以上的儿童设有语言班和扩大与北京高中的交换项目，从而在研究中国方面教育下一代。推广中文能力和提高跨文化意识是保证未来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关键，而在这个未来的世界中，中国与美国将是同等地位的伙伴。

*赫伯特雷文 Herbert Levin:*

从尼克松开始，美国历届总统都以和平的方式处理与中国的现代关系。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海峡进行无弹头的导弹试验时，克林顿命令美国的海军舰队改变航线，以作为对暴力的一种威慑。当美国的保护主义分子和人权极端分子企图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与他们不切实际的目标挂钩时，克林顿击败了他们。

同样的，布什总统也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批准对台军售，但也同时明确表明美国不会因为台独的挑衅而卷入与中国的冲突。

未来的总统无论属于哪一党派都需要得到支持，因为他们必须反对军事上的遏制狂热分子、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分子以及那些认为现代中国可憎，必须步步对抗的人。这个总统必须善用外交手段，还得有政治家的风范。美国自二次大战以来就在东亚地区起决定性的影响。这个特殊的时代已经渐渐接近尾声，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关系开始卷土重来。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进程并在其中灵活地参与，这个进程将无损美国的利益。

*洛德 Winston Lord (薛瑞福 Randy Schriver and 林蔚 Arthur Waldron 附议) :*

我认同本报告，因为它总的来说捕捉了中国的全貌和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之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积极和务实的议程和政策方向。我同意本报告大部分的分析、结论与建议，但是我对其中一些部分有相当不同的意见和保留，包括以下几点：

- 开头有关中国的国际行为的评估总结（第5页），就是“越来越遵守国际规则”和“更加留意美国的看法”——说得太客气了。真正的情况复杂得多——实际上，报告本身详尽地说明了中国的许多政策是有损国际准则和美国利益的，或至少是暧昧不明的。
- 报告严重低估了中国政治体系的残酷和近年来在政治改革和人权方面的退步。
- 虽然报告就美中贸易问题提供了很多相当不错的资料，但是读完这个部分之后总的印象是我们对华每天大约7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 我相信中国政治体系的本质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中国的国际行为。中国越开放、越人道、越民主，它在世界舞台上就越肯合作，而不是越有破坏性。但是本报告没有把这个因果关系说清楚，因此对鼓励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和尊重人权的重要性就强调得不足。

*林蔚 Arthur Waldron :*

本报告有我认同的长处，但我对一些关键问题有不同意见，归纳如下：

首先，本报告没有正视中国政权基本的不合法性和严重的弱点，也没有正视中国迟早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而到时候华盛顿有可能会措手不及。

第二，本报告有关中国目前的军事扩大的内容分量不够。这种发展已经在亚洲触发了军事竞赛，日本和其他国家自然会因此而谋求核武器。

第三，我认为本报告的经济分析有误导性且过分乐观。

第四，我相信台湾将继续作为独立国家存在，因此（从来未承认过中国对台湾有主权的）。华盛顿、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应当开始思考我们如何接受这个事实。

最后，我想起苏联。16年前，莫斯科放宽了对言论和媒体的管制，使政治反对党合法化，使国会和总统选举机制化并保证人民享有财产权。从那时候开始，卢布就一直全面浮动的货币。

如果中国真想成功，它也必须这么做。如果北京向莫斯科一样从根本上改革，那中美关系的前景是光明的。但是，如果共产党企图（像现在一样）不惜一切代价紧抱绝对权力不放，中国和该地区的不稳定和起冲突的危险将是严重的。

我在这方面的看法在别处有更详细的表达，见：  
[www.history.upenn.edu/docs/waldron\\_task\\_force.pdf](http://www.history.upenn.edu/docs/waldron_task_force.pdf)

## 工作组成员<sup>注释</sup>

### 罗杰尔奥特曼 Roger C. Altman

在美国财政部服务过两轮，先是卡特总统的助理财政部长，负责国内财政事务，后来是克林顿总统的财政部常务副部长。从 1996 年开始，奥特曼先生历任 Evercore Partners 的董事会主席和联席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是全球最活跃的精品投资银行。他也曾经担任过黑石集团的董事会副主席，负责该集团投资银行方面的业务。他刚加入华尔街时在雷曼兄弟公司工作，后来成为该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的联合主管，也成为该公司管理委员会和董事会的成员。奥特曼先生是纽约长老会医院、公共学校新前景及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理事会成员，也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投资委员会的主席。他是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成员，也是该理事会的财政与投资委员会的成员。他从乔治敦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从芝加哥大学获得企业管理硕士学位。

### 彼德贝斯 Peter E. Bass

担任 Promontory Financial Group, LLC 的执行董事和办公室主任。该公司是一家全球融资服务公司。他过去曾经是高盛的副总裁，负责国际政府事务并作为公司总裁和联席首席执行官的办公室主任。在加入私营部门之前，贝斯先生在政府任职十几年，在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理事会担任高级职位，包括主管能源、制裁和货品的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帮办和国家安全顾问的执行助理。

### 丹尼斯布莱尔 Dennis C. Blair

将于 2007 至 2008 年担任陆军学院战略领导 Omar Bradley 的讲座主任和狄更斯学院任教。他从 2003 至 2006 年是国防分析研究院 (IDA) 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该机构是一家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中心，总部设在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市。他在 2002 年从海军退役之前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总司令，该司令部是美国最大的一个作战司令部。在他 34 年的海军生涯中，布莱尔上将曾经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舰队中的导弹驱逐舰上服役，也曾经是小鹰号航母战斗群的指挥官。在岸上，他曾经担任中央情报局军事支持的联席参谋主任和该单位的副主任。他在国家安全理事会和几个重要的海军部门担任过预算和政策方面的要职。

### 海洛德布朗 Harold Brown\*

目前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法律顾问和托管理事会成员。他也是 Warburg Pincus 有限责任公司的合伙人和 Evergreen 控股公司和 Altria 集团的董事会成员。他过去曾经担任过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院

---

<sup>注释</sup> 工作组成员均以个人身份而非代表他们的公司或机构参与本项工作。

\* 显示该人士认同本报告并提出了附加或反对意见。

(SAIS)的外交政策研究院的主任。他于1969至1977年是加州理工大学的校长并于1977至1981年间担任过高级政府职位，包括国防部长一职。

### **埃斯顿卡特 Ashton B. Carter**

曾经（与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联合担任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预防性防御项目的主任和国际关系、安全与科学系的主任。卡特博士在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任期内担任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他曾经两度被国防部授予优秀国防服务奖，那是国防部的最高奖项。他也曾经被授予国防情报奖，以表扬他对情报工作的贡献。

### **傅瑞伟 Charles W. Freeman III**

是中国法律业务联理的执行董事。在2005年之前，他是主管中国事务的美国助理贸易代表，负责制定和实施美国对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和蒙古的整体贸易政策。在此之前他是美国参议员弗兰克穆考斯基（阿肯萨斯州共和党人）的国际事务顾问，工作的重点是贸易、国际金融及能源问题。在政府工作十年之后他以律师和新兴市场风险投资商的身份在波士顿的私营和非盈利部门工作，并担任过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亚太总裁和在香港担任亚洲基金会的经济项目主任。他目前也是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

### **亚伦弗里德伯格 Aaron L. Friedberg\***

从1987年开始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于2003至2005年担任副总统办公室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副助理。他是国务卿民主促进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他于2001至2002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第一位基辛格学者。

### **葛维宝 Paul Gewirtz**

是耶鲁大学的宪法学Potter Stewart讲座教授，也是该大学中国法律中心的主任。他教授过许多不同的法律领域，并出版著作。中国法律中心不仅是进行研究和教学，也就关键的法律和政策改革问题与中国的政府和学术机构进行合作项目。他曾从耶鲁大学暂时休职到国务院担任总统法治倡议的特别代表。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于1997-1998年的峰会中达成协议的“美中司法合作倡议”是他所构想和带头制订的。他于1998年陪同克林顿总统到中国访问。到耶鲁法学院执教之前，他是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瑟古德马歇尔的书记员，并在华盛顿的Wilmer, Cutler & Pickering律师事务所当律师。

### **莫里斯格林伯格 Maurice R. Greenberg\***

是C. V. Starr & Co., Inc.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他过去是美国国际集团公司（AIG）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于2005年3月退休。他也曾经担任过亚洲

协会的主席、美国菲律宾商业理事会的创建主席、美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副主席、美中商业理事会的成员、总统贸易政策与谈判咨询委员会和商务圆桌会议的成员。他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前任主席、副主席及行长。

### **何汉理 Harry Harding\***

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际事务教授，也是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访问研究员。他于 2005 至 2007 年担任欧亚集团的研究分析主任，该集团是一家总部设在纽约的政治风险研究和咨询公司。他至今仍是该集团的顾问和中国特别工作组的主席。何教授曾经在史瓦斯摩学院（1970-71）和史坦福大学（1971-83）任教，是布鲁金斯学会（1983-94）对外政策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和乔治华盛顿大学（1995-2005）埃列特国际事务学院的院长。

### **卡拉希尔斯 Carla A. Hills**

是 Hill & Company 国际咨询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就全球贸易和投资问题提供咨询。希尔斯大使曾经在布什总统的任期内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并在福特总统的任期内担任过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和司法部负责民事的助理司法部长。

### **法兰克赞努兹 Frank Sampson Jannuzi**

是对外关系委员会日立国际事务研究员，目前是在庆应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和在东京的国际政策研究学院担任访问研究员。他曾任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民主党办公室的东亚顾问（1997-2006）和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司的东亚政治和军事分析员（1989-97）。

### **迈克尔乔丹 Michael H. Jordan**

是 EDS 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他于 2003 年 3 月加入 EDS。他是 CBS 公司（过去是西屋电气公司）已退休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也是以下这些机构的成员：国家外贸理事会、布鲁金斯学会、美日商业理事会、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非裔大学基金会、商务理事会、美国国际商务理事会、商务圆桌会议及英美商业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他也是 Viventure 伙伴公司和 Aetna 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 **甘维珍 Virginia Ann Kamsky\***

是 Kamsky Associates, Inc. (KAI) 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该公司于 1980 年成立，是第一家被批准在中国营运的外国投资公司。甘维珍女士是美国美华协会的董事会主席，也是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在创办 KAI 之前，甘女士是大通银行的官员，并于 1978 年以第一批正式访华的美国银行业代表团的团员身份访问中国。当时美中的外交关系正常化刚被宣布。她是几家公司董事会的成员，包括 W. R. Grace，并在最近成为 Olin 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 兰普顿 David M. Lampton

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系系主任和教务长，也是华盛顿尼克松中心中国研究系系主任。他过去是位于纽约市的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会长（1988-97）。他的著作包括*同床异梦：处理1989-2000年的美中关系*（*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和由他校订的*改革时代中国对外与安全政策的制定过程*（*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他目前正在撰写一本书，内容是有关中国的力量及其对世界的意义。

### 拉迪 Nicholas R. Lardy

是华盛顿彼德逊国际经济学院的高级研究员。他过去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1995-2003），也是华盛顿州立大学 Henry M. Jackson 国际研究院院长（1991-95）。拉迪博士是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董事会和行政委员会的成员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会员，也是*中国季刊*、*中国评论*及*中国经济评论*的编委会会员。

### 赫伯特雷文 Herbert Levin\*

在华盛顿的政策制定理事会、国家情报理事会及国家安全理事会任职。在他34年的外交官生涯中，他工作的重点是中国和亚洲。之后他有5年的时间在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的办公室工作。再后来5年他在美中协会担任该协会联席主席塞鲁斯万斯和亨利基辛格的行政主任。雷文先生拥有哈佛大学和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的学位。他曾经随同美国陆军在美国驻东京的远东司令部服役。

### 李成 Cheng Li

是纽约哈汉米尔顿学院政府系的 William R. Kenan 讲座教授。他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外交政策研究项目的访问研究员，是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董事会的成员及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理事会成员。他的著作包括*重新发现中国：改革的动力与困境*（*Rediscovering China: Dynamics and Dilemmas of Reform, 1997*）、*中国新一代领导人*（*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 2001*）及编著*跨越太平洋两岸的思想桥梁：中美教育交流，1978-2003*（*Bridging Minds across the Pacific: The Sino-U.S. Educational Exchange, 1978-2003, 2005*）。他目前在撰写两本书：*中国技术官僚*（*Chinese Technocrats*）和*上海的城市次文化*（*Urban Subcultures in Shanghai*）。

### 洛德 Winston Lord\*

目前是国际救助委员会监督者（Overse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的联席主席。他曾在政府供职，包括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担任助理国务卿，负责国务

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曾任里根总统的美国驻华大使，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主任，福特总统和尼克松总统任期内的国家安全顾问的特别助理。在政府之外，他曾经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会长和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董事会主席。

### **吕晓波 Xiaobo Lü**

是 Weatherhead 东亚研究所的主任及巴尔纳德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是 *干部与腐败* (*Cadres and Corruption*, 2000) 一书的作者。他最近 (与 Thomas Bernstein 合著) 出版的一本著作 *当代中国农村有缴税权无代表权*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2003) 是有关中国农村的政治与经济变化。从 2003 至 2004 年，他是北京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也是香港城市大学的高级研究员。

### **麦艾文 Evan S. Medeiros**

目前是华盛顿兰德公司的政治科学家。他的研究内容包括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中美关系及中国国防工业问题。在加入兰德之前，麦博士是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防扩散研究中心有关东亚方面的高级研究助理。他于 2000 年到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CASS) 美国研究所担任访问研究员和中国外交学院担任客座讲师。他最近为史坦福大学出版社完成了一本有关中国防武器扩散政策进程的书。他经常到亚洲访问。

### **毛文杰 James C. Mulvenon**

是国防集团公司情报研究与分析中心的副主任和高级分析师。作为中国军事方面的专家，毛博士的研究重点是 C4ISR (指挥、控制、通信、电脑、情报及侦察)；国防研究开发，采收组织与政策；战略武器项目 (电脑网络攻击和核战争)；密码学；和中国信息革命在军用和民用方面的含义。

### **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

是哥伦比亚大学“1919 届毕业生”讲座教授和政治学系的系主任。他的著作包括 *中国的民主* (*Chinese Democracy*, 1985)、与 Robert Ross 合著的 (*长城与空城：中国对安全的寻觅*)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1997)、与林培瑞合编的 *天安门文件* (*The Tiananmen Papers*, 2001) 及与 Bruce Gilley 合著的 *中国的新统治者：秘密档案* (*China's New Rulers: The Secret Files*, 2002, 2003 再版)。他是中国人权和自由之家的董事会成员，也是人权观望亚洲咨询委员会成员。

### **欧伦斯 Stephen A. Orlins**



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在这之前，欧伦斯先生是亚洲最大的私人股本融资公司之一，凯雷集团亚洲的执行董事。他于 1983 至 1991 年在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任职，从 1985 至 1991 年是执行董事，接着从 1987 至 1990 年是雷曼兄弟亚洲部总裁。欧先生也曾经在纽约、香港及北京的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和 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 律师事务所当律师。他从 1976 至 1979 年在美国国务院的法律顾问办公室任职，当时他与那里的律师班子一同参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工作。

### **埃文斯里维尔 Evans J. R. Revere**

他于 2007 年 1 月开始担任位于纽约市的韩国协会的会长。在这之前，他是一名职业外交官和国务院主要的亚洲问题专家之一。他在国务院的最后一个任务是在对外关系委员会担任一名从事外交研究的塞卢斯万斯研究员。他参与发起了有关美中关系的独立工作组，并作为该工作组的首位项目主任。里维尔先生过去也担任过负责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和首席助理国务卿帮办，负责处理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关系并管理一个拥有 950 位美国外交官和大约 2500 位外国籍的外交服务人员的机构。他的外交生涯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韩国与日本服务，并在与北朝鲜谈判方面经验丰富。

### **布拉德里罗伯特斯 Bradley H. Roberts**

是位于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国防分析研究院（IDA）的研究人员。他也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客座教授和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美国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在 1995 年参加 IDA 之前，罗伯特斯博士曾经是《华盛顿季刊》的编辑，也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与 Robert A. Manning 和 Ronald Montapero 合著了 *中国、核武器与军控 (China, Nuclear Weapons, and Arms Control)* (2000) 一书。

### **容安澜 Alan D. Romberg**

是 Henry L. Stimson 中心的东亚项目主任。在这之前，容安澜先生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的首席副主任（1994-98），美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华盛顿办公室的高级顾问兼主任（1998-99）及海军部长的特别助理（1999-2000）。他在对外关系理事会担任将近 10 年（1985-94）的 C. V. Starr 高级亚洲研究员之后，于 1994 年成为美国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主任。他当美国外交官有超过 20 年的时间，曾经是国务院的一位首席助理国务卿帮办和副发言人（1981-85）。他最新出版的一本著作是 *悬崖勒马: 美国对台政策和美中关系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U.S.-PRC Relations, 2003)*。

### **薛瑞辐 Randy Shriver\***

是阿米蒂奇国际 L. C. 的五位创始人之一。在回到私营部门之前，他是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蒙古、香港、澳大利亚、

新西兰及太平洋岛屿事务。他曾经在国防部长办公室任职，也是一位曾经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服役的海军情报官员。

### **雯狄舍尔曼 Wendy R. Sherman**

是全球咨询公司奥尔布赖特集团和重点是新兴市场的投资咨询公司奥尔布赖特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她曾经担任国务院的法律顾问，总统和国务卿的北朝鲜特别顾问及主管司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负责确保国务院每年获得超过230亿美元的预算拨款。作为两任国务卿的首席解决问题老手，舍尔曼大使的工作范围包括亚洲、中东、中美洲、北朝鲜、俄罗斯及古巴和其他跨国问题。

### **林蔚 Arthur Waldron\***

是宾西法尼亚大学的 Lauder 国际关系讲座教授。他于1971年（以最优异的学业成绩和毕业生代表的身份）获取哈佛大学的学士学位，并于1981年获取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他在亚洲居住过4年，在那里学习中文和日文。他在职业生涯的初期曾经住在英国一年，在法国一个学期，在（当时的）列宁格列国立大学一个学期。他也曾经在比利时的鲁汶天主教大学担任过访问教授，并在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所担任过访问研究员。他用英文出版过三本书，并校订过四本书，其中两本是以中文出版。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意大利文、韩文与日文。林蔚教授是自由之家和 Jamestown 基金会董事会的成员，也是总部设在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一个非党派、非营利研究组织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Center）的副总裁。他三十年来经常访问中国。

## 工作组观察员

孔杰融 Jerome A. Cohen, 对外关系理事会

易明 Elizabeth C. Economy, 对外关系理事会

史国力 Adam Segal, 对外关系理事会